

第六章

閩變平息、圍剿得手



飛將軍 蔣鼎文



一、對蔡廷鍇好難下手

福建事變的不期然發生打亂了蔣介石圍剿紅軍的部署，他不得不放緩步伐，先行解決這場突如其來的武裝叛亂。

久圍未絕的中共紅色武裝了。於是，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蔣介石作出圍剿中央紅軍的軍事佈置，「北路軍進剿準備，務限於九月二十日以前一律完畢」。¹進剿軍隊的序列為：總司令劉峙，前敵總指揮蔣鼎文，下設四個縱隊，以衛立煌、薛岳、陳誠、趙觀濤各指揮一個縱隊。

作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蔣鼎文根據蔣介石的命令緊鑼密鼓地調遣軍隊，制訂軍事作戰計畫。

至於突發的福建事變，事實上醞釀已久。寧粵分裂期間，相對超然的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及其十九路軍成了香餽餽，寧粵雙方都竭力爭取。蔣介石運用綜合資源及其與陳銘樞的公誼私交，成功地籠住了十九路軍，陳還出任了京滬衛戍司令，十九路軍亦隨之調往京、滬駐防。「一二·二八」淞滬抗戰發生，陳、蔣、蔡的十九路軍與張治中的第五軍互相配合，堅守上海一個多月，對日本侵略軍予以猛烈還擊，受到國人的擁護和支持。

淞滬抗戰結束後，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奉令對紅軍開戰。陳、蔣、蔡對淞滬停戰協定表示不滿，對蔣介石的妥協政策表示不解，於是或明或暗地與兩廣人士合謀抗日反蔣，陳銘樞一度拒絕出任福建綏靖公署主任之職。

十九路軍對抗日之事還是念念不忘，當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軍對熱河榆關發起攻擊之時，

¹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一五頁。

蔣光鼐電召時在閩西視事的蔡廷鍇速回福州商議。兩人「彼此談及敵進攻熱河甚急，我軍原為抗日鼻祖，應向中央請纓，縱不許我軍全部出發，亦應以一部先遣策應，鼓勵前方士氣，並擬先在各師抽調志願官兵編為兩旅」¹。

粵桂及廣州亦回應抗日之議，同意合編三個師，連同十九路軍志願軍組成先遣軍，並以公推方式，請蔡廷鍇出任「援熱聯軍前敵總指揮」。然當先遣軍由永定進入粵地後，粵當局竟然不允先遣軍過境。對陳濟棠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做法，蔡甚感不解，同時亦為福建事變時期的雙方不合作埋下了伏筆。

「粵當局一面贊成抗日，並答允派兵歸我指揮，一面又暗中監視與擋駕，此種兩面策略、虎頭蛇尾行為，實令人憤慨。」²

當蔡部先遣前鋒抵達耒陽時，熱河及各關口相繼陷落，繼而何應欽經汪精衛、蔣介石同意，與日軍簽訂了《塘沽協定》，中央政府命蔡部回閩。「我軍請纓無路，忍痛回師，再作抗日救亡之圖。」³抗日未成，又受到陳濟棠等人的夾板之氣，且白白損失二十餘萬元軍費，蔡廷鍇感到有說不清的痛楚。

當時，蔣介石委李濟深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兼右路司令官，李濟深遠走香港，拒絕出任。未幾，陳銘樞從歐洲考察歸來返抵香港，與第三黨領袖黃琪翔及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奔走聯

1 《蔡廷鍇自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三〇八頁。

2 《蔡廷鍇自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三〇八頁。

3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二頁。

絡，加快步伐策劃起反蔣事宜來。

閩方人士與兩廣實力派人士陳濟棠、李宗仁等商議反蔣具體策略，以期一致行動；

閩方人士又與中華蘇維埃及工農紅軍簽訂「抗日反蔣初步協定」，以期組成統一陣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陳銘樞、李濟深、黃琪翔、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州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選舉李濟深為主席，陳銘樞等十一人為委員，將十九路軍改稱為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蔡廷鍇為總司令；更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脫離中國國民黨，成立「中國人民生產大眾黨」；廢止青天白日旗，以上紅下藍兩橫條中嵌黃色五星為國旗。福建事變就這樣爆發了。

福建事變實是內部意見尚未統一，外部又未達成共識，且是在改國號、立新旗、造新黨這樣毫無理論和廣泛群眾基礎上的貿然行動。

對於福建事變的發生，蔣鼎文似乎比蔣介石先得到消息，他是這樣回憶的：我任贛鄂粵閩湘五省剿匪北路軍前敵總指揮時，「委員長親自到南昌督導剿匪，我從長江艦隊朋友處得到福建有不穩的消息，說中央銀行被封了，要另外成立政府了，蔡、陳要反叛中央了，我就去見委員長，把我聽到的消息一一向他報告，委員長不太十分相信，對我說：『銘三，不要輕信謠言。』大概是十一月初，委員長特別要我去見他，告訴我：『蔡廷鍇果然造反了！』他很生氣地把一大疊電報扔在地上大發脾氣，似乎對福建除了軍事以外別無他途了」¹。

蔣介石頓感枝節橫生，然當他看到「福建人民政府」這樣的成立宣言，這樣幼稚的政治舉止時，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二頁。

內心不免竊笑，他決心運用精銳部隊，在短時間內就撲滅這團火焰。

不過，落實到具體軍事部署上，蔣介石就瞻前顧後、苦思詳慮起來。他深恐「福建人民政府」與中央紅軍聯手，共抗於他。如此反蔣力量陡增，很難對付，他的剿共計畫將全盤皆亂。這種不期而至的重壓在蔣介石身上也不經意地流露出來，他時而自言自語，時而揮拳舞掌，時而高聲朗讀剿匪手本，時而一曲軍歌嘹亮。侍衛長宣鐵吾看到蔣介石這種反常的舉動，頗有些緊張，只得去找南昌行營第一廳副廳長晏道剛共同觀察蔣介石的舉止，待觀察一段時間後，兩人放下心來，並私下嘀咕，「唉！這老頭子在發神經了。」

蔣介石在作出軍事行動之前，又把蔣鼎文叫去，他說：「銘三，十九路軍欺人太甚，忍無可忍了。對福建的情形，你最熟悉，中央軍的部隊任憑你自己挑選幾個精銳的師，我以一切方法支援你，你以速決方式深入福建剿平閩亂。」

對於武力討伐福建，蔣鼎文早有思想準備，然對委員長讓自己統率軍隊入閩消滅蔡廷鍇的十九路軍，則感到突然，於是波瀾頓生，起伏難平。

對於蔡廷鍇，蔣鼎文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們相識於廣東，北伐時又一起入湘進鄂，共同攻打武漢，擊潰吳佩孚；中原大戰中，蔡部在津浦路上作戰，其後，又在隴海線上與蔣鼎文等友軍圍殲西北軍；兩年多以前，蔣的第九師與蔡的十九路軍同生共死，在高興墟與紅軍苦苦血戰；一年多以前，他們又在淞滬合力抗擊日軍，一個在第一線血戰，一個在第二線持戈待命。幾番生死與共，幾番共同對敵，彼此之間除深厚的感情外，也互相「英雄」相惜。對此，蔣鼎文不勝感慨，「可以說，沒有我便沒有十九路軍，沒有十九路軍也沒有我蔣銘三，現在要與當年共生死共患難的袍澤相廝殺，

的確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¹。

蔣介石素以具有洞燭入微、深入人心的特長而著稱於世，見一向幹練爽快的蔣鼎文遲疑不決，頓時明白其所思所想。

「銘三，你還在猶豫什麼？他們的人民政府與共匪勾搭，把總理遺像扔掉，拋棄國民黨，創立自己的新黨，我們與他們是『主義』之爭，是勢不兩立的不同陣營。」

蔣介石所說確非虛言。

蔣鼎文點頭，稱願聽委員長一切安排。

前文已述，蔣介石原來安排讓劉峙出任北路軍總司令，蔣鼎文任前敵總指揮；適逢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因兒女親家趙啟（為江蘇省政府委員、民政廳廳長）賣官鬻爵，對縣長、公安局長等職以任職之地的好差明碼標價，醜聞傳出，輿論譁然，顧祝同聲名狼藉，又因江蘇《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被陷害案遭致監察院彈劾。至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旬，顧無奈辭去江蘇省主席之職，由陳果夫繼任。蔣介石乃將剛卸任的顧祝同調到剿共前線，替代劉峙之職，讓劉峙繼續去河南總攬黨政軍一攤。真是機緣所至，顧、蔣又一次開始了他們人生履歷上的重要搭檔。

閩變發生後，蔣介石安排顧祝同繼續在江西剿共，而命蔣鼎文將重心轉至平閩。南京國民政府軍平定福建事變的軍事序列如下：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北路前敵總指揮蔣鼎文；第三路軍總指揮蔣鼎文，第三師師長李玉堂，第九師師長李延年，第八十師師長陳明仁，浙江保安處處長蕭乾；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二頁。

第四路軍總指揮張治中，第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第五十六師師長劉和鼎，新編第十一師師長周志群；第五路軍總指揮衛立煌，第十師師長李默庵，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第八十三師師長劉戡，第四師師長冷欣，第八十九師師長湯恩伯。

同時，蔣介石又命毛邦初為空軍指揮官，命陳紹寬為海軍指揮官，從空中和海上配合陸地作戰部隊，進行偵察、封鎖和轟炸。運用陸、海、空立體攻擊作戰，確係空前。

蔣鼎文除以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和第三路軍總指揮名義外，其所在的指揮部還單獨設立一個協調黨軍政地各方工作的黨政處，這為其他兩路軍所沒有，顯係履平閩總指揮之職，而蔣介石自任討逆軍總司令。

當時「福建人民政府軍」方面的軍事序列為：中華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中華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蔡廷鍇、總政治部主任陳銘樞、副主任徐名鴻、總參謀長鄧世增、副總參謀長范漢傑；第一軍軍長沈光漢，第六十師師長劉占雄，第一師師長鄧志才；第二軍軍長毛維壽，第六十一師師長梁世驥，第二師師長龐成；第三軍軍長區壽年，第七十八師師長雲應霖，第三師師長張君嵩；第四軍軍長張炎，第四十九師師長阮寶洪，第四師師長謝瓊生；第五軍軍長譚啟秀，第五師師長趙一肩，第六師師長司徒非；特務團團長李金波；軍官補習所所長余華沐。¹

這次投入平閩的部隊，除原駐閩北劉和鼎的三十九軍外，其他均係蔣介石嫡系精銳之師，可見其速戰速決決心之大。

攻擊部隊的大致進軍線路為：

1 雙方序列引自姜克夫《民國軍事史略稿》第二卷，有些書籍記述略有不同，但實質一致。

蔣鼎文這一路，李延年第九師等部由贛東進入閩北，於建陽、建甌一帶集結，其中的李玉堂師則通過海輪運至閩南廈門登陸，斷十九路軍海上退路；張治中這一路由衢州進入閩北之浦城、建甌一線；衛立煌這一路從贛東進入閩西之邵武、順昌部署。

空軍和炮兵大多集結到建甌，海軍在福建沿海遊弋巡視。同時，蔣介石對十九路軍內部進行策反。

蔣介石飛到建甌設立行轅，親自指揮各部攻擊，而蔣鼎文負具體指揮之職。在「十二月中旬，中央軍約十餘萬人由蔣鼎文統率，兼程自浙、贛兩省分路南下入閩」¹。

各部進攻目標指向明確，即首先奪取福州，蔣命令以「先攻破逆軍之主力，並將其餘逆部，由南北兩方夾擊，一舉而殲滅之」²。

這邊張弓搭箭，蓄勢待發；那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福建一方，負軍事之責的蔡廷鍇和參謀團主任黃琪翔等人認為：中央軍的部隊被紅軍所牽制，是抽不出兵力攻打福建的，且福建背靠江西蘇區，又面臨大海，蔣軍無法展開部隊進攻。因而，閩方把十九路軍的幾個主力師配備在閩南沿海一帶。延平、古田只有譚啟秀由新兵編成的趙一肩、司徒非兩個師。及至接獲蔣介石對十九路軍發動進攻情報後，在如何應對上，蔣、蔡和參謀團又發生意見分歧。蔡主張將部隊主力佈防在延平、沙縣、永安一線，這一帶背靠閩贛蘇區，又有閩北山區為依託，冀圖在閩北與蔣軍決戰；蔣光鼐認為蔣軍兵力雄厚，不宜與他們決戰，應放棄福州，撤向閩南，向廣東靠攏，以保存實力；黃琪翔為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四九五頁。

2 臺灣《國民革命戰史》第四部第四卷，第六八三頁。

首的參謀團則認為福州係人民政府之首都，決不能放棄，應在福州週邊決戰。議論紛紜中，支持黃琪翔意見的將領占了多數，於是將駐沿海的部隊向福州調集佈防。正是由於事先估計不足，加以作戰方針幾次變更，故戰機喪失，福建人民政府軍的攻防部署從一開始就陷入被動局面。

對此，蔡廷鍇作為軍事主管事後也有檢討：

那時我名為高級指揮官，仍以虛心待人，關於戰略戰術，人各其說，意見紛歧，莫衷一是。初本擬以主力集中閩北，後有人謂要保護政治重心是福州。我明知福州四面皆水，我方缺乏海軍，易攻難守，但眾意要調主力返福州，我亦無可如何，只留譚啟秀軍一小部守延平、水口、古田各處，而主力調抵福州，戰略又變更了，令我帶主力向延平攻擊前進。¹

蔣介石十二月二日頒發作戰計畫後，武裝攻擊福建人民政府之役迅猛展開，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親飛至蒲城指揮，一月五日還到了建甌前線。

十二月二十八日，蔣鼎文將駐壽寧的閩軍收編，即將其編成中央軍新十師。所指揮的幾個師不費多大力氣，就通過浙江泰順至仙霞關防線進入閩北，進而折南指向古田。同一天，李玉堂之第三師，力勸廈門市長黃強投誠，接應其部經海上登陸成功。

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旬，衛立煌之宋希濂三十六師會同劉和鼎部，在十多架飛機掩護之下，向駐守延平（南平）的十九路軍第十師司徒非部攻擊，司徒非師力不能支，即向劉和鼎投降，延平被攻克。

1 《蔡廷鍇自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三一四頁。

延平為閩北之要衝，而古田、水口則為福州兩個屏障，這兩處若失，福州之門大開，自是不能據守。

一月七日，蔣鼎文所部李延年第九師圍攻水口，並於同日突破守軍防線，攻陷水口。駐守在此處的為第十九路軍第五軍譚啟秀部，譚在此地部署一個多團兵力，見第九師來勢兇猛，甚是慌張。

據宋希濂說：

當時因蔣軍聲勢浩大，防守水口的部隊相當驚慌。據第九師師長李延年親自告訴我說：「我們拿下水口，是個通訊兵的功勞。我們部隊到達水口附近後，我率第九師幹部正在一個山頭觀察形勢，忽然一個通訊兵跑來報告，說在長途電話線裡可以聽到敵軍的通話。於是我立即叫一個參謀去竊聽，不久那個參謀回來報告，說聽到那個團長和譚啟秀通話，十分恐慌，一再要求增加部隊，譚則說無兵可派等語。我利用了這個有利的消息，立刻派一個團開始攻擊。敵人扼守在橋一邊，我軍炮兵只打了幾十發炮彈，步兵開始向前衝，敵軍就動搖了，紛紛向福州方面逃竄。本來以為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拿下的水口，結果只傷亡十餘人，不到一個鐘頭就解決了。」¹

張治中指揮王敬久第八十七師等部圍攻古田，其時據守古田的是第十九路軍第五軍趙一肩第九師。趙在「一·二八」抗戰時為蔡廷鍇的參謀處長，與張熟識，故而張治中不想用武力攻擊的方式拿下來。蔣介石見張部進展緩慢，甚為不快，要求蔣鼎文催促張治中快速進攻，並限張

¹ 宋希濂：《鷹犬將軍》，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八五—八六頁。

即時攻下古田。張治中是這樣回憶的：

蔣鼎文是第三路總指揮，在我路的右翼，迭次責問我：為什麼屯兵城下，還未進攻？同時，我的軍（師）長王敬久也三番五次打電話給我，說蔣總指揮催促攻城。後來蔣鼎文竟直接要王敬久進攻，王敬久又來請示，問我為什麼不發攻城命令，表示焦灼為難的樣子。當時，只要我稍微遲疑一下，就炮火連天了。我這樣想：趙一肩一共有三團人，有幾十挺機關槍，而且工事築得非常堅固，實在不容易進攻，攻必死傷重大。我就對王軍（師）長說：「我是總指揮，沒有我的命令，不准開槍，上面由我負責，不關你們的事。上面要砍頭，砍我的頭，但你們如果不服從我的命令而開槍，我就要砍你們的頭！」這樣，前線才安定下來了，否則一槍放出，即無法挽回。這是我對於部下的制止。對於上面如何答覆呢？我在蔣鼎文傳達命令限即攻克古田的時候，電蔣表示絕對負責的態度：「乞鈞座勿問職所用者為和平方法抑軍事進攻，總之，在明日正午十二時以前必將古田解決，如違願依軍法伏罪！」這一個電報上去後，我的部下，尤其是幕僚人員，大為愕然，替我深深地捏一把汗。但我就在這個時候，把握現實，加緊與趙一肩接洽。同時，在趙一肩方面，因為聽到了上面的消息，知道並相信：我之駐兵城下，按兵不動，確屬誠意講和。我又派參謀長祝紹周親自到對方去磋商。祝和趙一肩是熟人，而且我所派的是一個重要的參謀長，趙乃無話可說，表示完全接受了。」¹

此前，蔡廷鍇親率劉占雄、阮寶洪、雲應霖三個師向太湖、白沙疾進，意圖奪回水口，以解古

1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華文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五七頁。

田之圍，然水口不但未奪回，古田亦於一月十二日失去了。

水口一下，古田又失，蔣鼎文率第九師等部迅即向福州前進，衛立煌率部亦從仙遊方向過來，福建人民政府已陷於軍事包圍中。

事已至此，首腦人物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陳友仁等要員匆忙撤走，乘海輪遠走香港。蔣鼎文部幾乎兵不血刃占領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垮臺，為時僅僅兩個月。

蔡廷鍇則率第十九路軍四個軍的兵力向泉州集結，南下途中，遭衛立煌部攔腰截擊，雙方發生激戰，蔡部力將阻擊部隊擊退，旋進入泉州。

當蔣軍向泉州發起攻擊時，還有一個細節。洛陽橋橫跨泉州灣，長而且寬，全由石塊砌成，堅固美觀。據說當年宋仁宗南巡至此，說此地風景頗像洛陽，故而以後就叫洛陽鎮，其橋便叫洛陽橋，成為當地一處名勝古跡。

洛陽橋南岸西側有張家山，橫亙東西，綿延數里，俯瞰泉州灣和洛陽橋。當李默庵第十師陳沛第二十八旅尾隨追至此，見海濤翻滾，大橋敞開，恐有設伏，頓時滯兵不敢向前。其時十九路軍毛維壽部駐守於洛陽橋。

陳沛一直在蔣鼎文第九師任團、旅長之職，時調至第十師不久。陳為人機敏果斷，深知及時攻佔洛陽橋之重要。他因在海邊長大，熟悉海水潮漲潮落規律，於是設法乘潮退之機，以夜色為掩護，徒步率眾偷渡海灘。對方守軍發現，但為時已晚。陳沛部乃發起強攻，奪取洛陽橋側制高點，洛陽橋亦為該部所占據。這就是平閩戰事中著名的「洛陽橋之役」。

陳因此仗作戰有功，被晉升為中將師長，主攻團長陳牧農晉升為少將旅長。蔣介石、蔣鼎文、

衛立煌分別給該旅官兵各獎大洋五萬元、二萬元、二萬元。

泉州攻下後，十九路軍各部軍心動搖，派代表向蔣鼎文和衛立煌提出投誠，願無條件接受中央整編。蔣、衛派陳沛等人於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九路軍指揮部，與十九路軍張炎、沈光漢等洽談改編事宜。

蔡廷鍇見失敗已不可挽回，乃單獨一人乘飛機至漳州、龍岩，然後轉道汕頭再避走香港。對於泉州的失守，蔡廷鍇是如此回憶的：

我先行抵泉州時，即與毛維壽面商今後大計。我知毛已有異志，當時我著其派兵在洛陽橋等處佈防，他亦態度曖昧。後我見機行事，向他說：「我們做事為團體，為革命，雖敗無憾，請你安心。十九路軍除譚啟秀新成立部隊不能存在外，其餘四軍之眾，均無損失，我全交於你，你可明日通電投降。我今晚乘機飛漳州，率殘部退守龍岩，再作良圖。」他見我如此表示，即眉飛色舞，洋洋得意，翁照垣、趙錦雯等亦無表示。時將黃昏，我即單人乘一練習機返漳州……是晚終夜不寐，晨早又乘機飛龍岩，傅柏翠等亦到，在龍兩日，無甚消息。聞毛維壽已接受南京投降為第七路軍，毛為總指揮，張炎副之。張不就，沈光漢、區壽年均為毛排除，翁照垣與宋希濂等接洽，擬乘機掌握十九路軍又成妄想。¹

蔣介石當然不可能讓第十九路軍將領來掌握其舊部，對於這支名聲響亮、頗具戰鬥力、但桀驁

1 《蔡廷鍇自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三一四—三一五頁。

不羈的部隊，必須加以整編，以便能從容調度。

於是，他與蔣鼎文這位多次整編過各色部隊的老手商量起整編計畫來。

在這期間，還發生了一段頗值玩味的插曲。原來，對於圍剿中央紅軍，蔣介石已經醞釀出更大的方案。福建事變發生之前，當時組成圍剿紅軍的戰鬥序列為北路軍和南路軍，以南北夾擊贛南閩西中央紅軍，同時十九路軍也是剿共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時不時派他們守防陣地參與作戰。北路軍圍剿總司令原為劉峙，後調顧祝同來，蔣鼎文是北路軍前敵總司令；南路軍總司令為陳濟棠，副總司令為白崇禧（未到職）。福建事變一發生，蔣介石抽調北路剿共的主力部隊，再從其他各地調入一些兵力，由蔣鼎文以北路軍前敵總指揮的名義，以強大兵力入閩，彈壓十九路軍。福建事變平息後，福建除長汀一帶為中央紅軍控制外，全境幾為蔣介石所控制。

至一月上旬時，蔣介石認為福建已事實上成為「獨立戰區」，在這裡組成一路軍隊，可從東向西圍剿進攻紅軍，如再將進入福建的部隊作為「北路軍」的一部分，不但名實不符，且不利於部隊調動，對圍剿紅軍不利，故他要單獨成立一支「東路軍」，且以入閩的部隊為基幹組成，讓蔣鼎文出任東路軍總司令。對此方案，蔣介石徵求了蔣鼎文的意見，並於一月十二日擬任命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

然蔣鼎文似乎並不願意升任這一要職，幾次三番推辭，至二月三日，他乾脆書面電報直陳蔣介石，並講了不願擔任這一職位的理由：「為統一指揮江西、福建匪患，已有顧祝同總領各軍，無須再設東路總司令，若方便指揮，則可由陳誠、衛立煌分掌前敵總指揮任務。」¹

1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蔣介石從他所處的位置和視野考慮全域，這不是蔣鼎文所能想及的，於是在第二天，也即二月四日，他給蔣鼎文下達了不容推辭的命令：「即就東路軍總司令職，勿再謙辭。」¹為了堅定蔣鼎文出任新職，斷他一再辭讓的退路，蔣介石乾脆將其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免去，由陳誠接任此職。

這種獨當一面的「方鎮」司令，權傾豈止一方？其他人求之不得，而蔣鼎文卻一再推讓，由此看來，蔣鼎文既無政治上的野心，也缺少宏大遠圖。

收編十九路軍，作實質性安排的是蔣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蔣介石核准蔣鼎文上報的「關於收編十九路軍辦法」，營長以上調離本營，以下官兵點械收容，或留或離，三日以內表態。旋之，十九路軍集中在惠安、浦城、福州聽候整編。

十九路軍當時約五萬人，號稱五個軍，實從五個師擴編而來，經過作戰、出逃、退職、還鄉等，人數又有減少。國民政府將其整編成中央軍四個師：原沈光漢的六十師師長之職，由陳沛接任；原毛維壽的六十一師師長之職，由楊步飛接任；原區壽年的七十八師師長之職，

由文朝籍接任；原張炎的四十九師師長之職，由伍誠任接任。

十九路軍官兵多係粵人，所以在配置主管和中下級軍官人士時亦多考慮由粵籍人士和黃埔軍校生出任，四位師長中陳、文是廣東人，楊是浙江人，伍是福建人。以下對這四位師長作簡單介紹：

陳沛，廣東茂名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一九二七年十月後，一直在蔣鼎文的第一師和第九師任職，先後出任師部參謀、團長、旅長之職。閩變前，剛調至第十師任職，重又納入蔣鼎文麾下。此次洛陽橋一戰有功，再赴第十九路軍談判收編得體，經蔣鼎文報請蔣介石批准後，委其出任

1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原十九路軍第六十師師長之職。

楊步飛，浙江諸暨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東征中身負重傷，蔣介石曾在「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學錄序」中提名懷念。歷任營長、團長，繼在馮軼裴（後顧祝同）警衛軍中出任旅長。「一·二八」淞滬抗戰時，由八十七師、八十八師組成的第五軍赴滬迎敵，軍長張治中兼八十七師師長，俞濟時為八十八師師長，楊步飛任八十八師二百六十四旅旅長。俞濟時、楊步飛、宋希濂、錢倫體等聯合署名，通電全國：「誓與我十九路軍親愛將士，喋血沙場，共同生死……寧為戰死之鬼，羞作亡國之民。」¹一時名震全國。在一個多月的淞滬戰鬥中，

楊步飛所率之旅與十九路軍一起抗擊敵軍，灑下熱血篇章。時過境未遷，又是在張治中的率領下，楊步飛卻以八十八師副師長兼二百六十四旅旅長身分，與當年並肩作戰的抗日友軍，在福建干戈相向。而委楊出任六十一師師長之職的安排，與粵籍官兵自多了一份感情上的親近，同時蔣鼎文又安排黃埔一期生、廣東籍的吳斌出任該師少將參謀長，以利於楊步飛開展整合工作。

伍誠任，福建莆城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兩次參加東征和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連長、營長、團長等職。其後任國民政府警衛第一旅旅長、開封警備司令，繼任八十七師獨立旅旅長、八十七師參謀長兼二百五十九旅旅長，參加過淞滬抗戰。一九三三年八月，八十七師與八十八師四個補充團新編成三十六師，由宋希濂出任師長，伍任該師參謀長兼第一百零六旅旅長。三十六師在攻克延平一戰中有功，獲蔣介石通電嘉獎。如今安排伍誠任為第四十九師師長，既是對他的嘉獎，也與他和十九路軍官兵相熟有關，這一布局亦為得體。

¹ 宋希濂：《鷹犬將軍》，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六七頁。

文朝籍為唯一不是黃埔一期出身的新任師長，不過文的資歷比以上三位更深，而且他又是廣東文昌人士。文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學校，其後又到陸軍大學特別班學習，歷任上海市公安局長、第十四軍參謀長等職，後調入劉戡的八十三師擔任參謀長，亦參加「平閩」之役。劉戡是黃埔一期生，自第九師成立以來，長期在蔣鼎文手下任團長、旅長之職，此次劉以八十三師師長身分率部參戰。從籍貫、資歷、隸屬關係講，文出任第七十八師師長也是適得其所。

十九路軍這支善戰之師就這樣被分而析之了。投誠於蔣軍的原第十九路將領毛維壽、張炎歸入中央軍第七路軍序列，分別出任正、副總指揮之職。

整編當中，也還有些人事安排上的花絮。據陳沛回憶，當張炎得知陳沛將任第六十師師長時，要他慎重考慮，並說為他擔憂。張告訴他，第六十師為十九路軍的起源部隊，所有幹部與蔡廷鍇敵血立誓過，接任這種部隊，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力勸他調到張所任職的、相對單純的第四十九師去任職。

陳沛把張炎的勸告如實地向衛立煌和蔣鼎文作了彙報，衛極表同情但苦無良策，他的老上級蔣鼎文聽後則哈哈大笑，旋之回答了陳的疑慮和擔憂：「關於這個問題，確有顧慮，蔣委員長早見及之，已特別叮囑本人指定貴官接任第六十師師長，關於人事方面，則可權宜由貴官運用，逐步轉變，以收軍心，蔚為國用。」¹

這次整編十九路軍，師長一職由蔣鼎文擬就後報蔣介石定奪；而師以下一級，蔣鼎文授權師級主管，權宜行事可也。實際整訓中，大批軍校出身的骨幹充實了營、連長一級崗位。

由這四位接替十九路軍四個主力師長之職，確是「二蔣」精心選定。當部隊改編初定，七十八

1 陳沛：《當機立斷之八戰》，臺灣一九七四年刊印，第七八頁。

師開赴河南歸德，六十師移至開封，海運至上海輾轉，這兩個師在劉峙的督導下繼續整訓；而六十一師、四十九師仍留在閩南整訓，由蔣鼎文整訓後移防他處。

福建事變尚未完全結束，蔣介石就任命陳儀為福建省主席。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即蔣鼎文得知後大為不悅，說蔣介石事前曾暗示他，閩變平定，即委他為福建省政府主席，如此說話不算數，使他臉面無光。

這種說法多來自於特殊年代形成的那種「文宣體」的文史資料，包括宋希濂在上世紀六〇年代上半期寫成的自傳體著作《鷹犬將軍》。宋是這樣描述他所聽到的：

我師隨第九師之後到了福州北邊的一個市鎮——洪山橋，那時蔣鼎文正在那裡，我去見他。通常在打了勝仗的時候，人總是興高采烈，但出我意外的是蔣鼎文卻一點歡樂的樣子也沒有。他板著面孔懶洋洋地對我說：「十九路軍大部隊離開福州才一兩天，委員長已命第三師由馬尾乘船，在海軍艦隊的掩護下，到廈門登陸後直取漳州，第九師暫留在福州附近，三十六師應即時由峽口（峽口在福州東邊二十多華里）過江，沿公路向南追擊。」我看他態度不好，接受任務後就退出，心裡感到很納悶，便到黨政處去找顧希平。他是我在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同學，彼此見面很熱情，聊了一會兒，我就問他：「我剛才見蔣總指揮，他好像很不高興，懶洋洋地對我說了幾句話。我看他態度不對，沒有說什麼就出來了，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嗎？」顧希平連忙搖著手對我說：「老宋，你不要誤會，我們一路來，在路上他常說你能幹，從未說過什麼不好的話。蔣銘公的生氣，是為了福建省主席的問題。在江西出發前，委員長（指蔣介石）

叫蔣銘公的總指揮部設立一個黨政處（其他兩個總指揮部是沒有的），並授權於他，沿途可以委派地方行政人員。因此，蔣總指揮認為打下福州後，一定會發表他為福建省政府主席，所以帶來的人很多，單是黨政處就有二百多人，許多都是蔣銘公的親友推薦來的。但昨天晚上收聽中央廣播電臺的消息，行政院已決議派陳儀為福建省政府主席，蔣總指揮聽了後，氣得暴跳如雷，一腳把收音機都踢翻了……」這是本文中的一段插曲。可以看出蔣介石集團中是一些什麼樣的人物，可說一切就是為了升官與發財。¹

同樣性質的傳說也見之於這時期另一當事人的回憶，而被回憶的對象則是平閩另外一位要員衛立煌。回憶人是入閩作戰的八十三師副師長陳鐵，他說：

福建問題解決後，蔣介石任陳儀當省主席，任蔣鼎文當綏靖主任。衛立煌率部駐泉州，每天都打電話要我去，大發牢騷，說：「仗要我們打，官給別人做，太不公平了。」後來，衛率軍部和直屬部隊進駐福州。所屬第十師、第八十三師開閩西歸蔣鼎文指揮，駐連城、朋口一帶，準備防阻贛南紅軍向福建進軍。²

不難看出，陳鐵這個回憶，在時間、節點上似乎都亂套了。陳儀當福建省主席是一九三四年一

¹ 宋希濂：《鷹犬將軍》，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七七—七八頁。

² 陳鐵：《我與衛立煌》，《中華文史資料庫》第九卷，第五八頁。

月，蔣鼎文當綏靖主任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衛立煌的部隊歸蔣鼎文指揮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份即開始，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份蔣鼎文出任東路軍總司令，所有入閩的軍隊都歸入東路軍指揮。而衛立煌也不是不做官，東路軍成立後他出任了前敵總指揮一職。

以上這些回憶，也許是當事人年高記憶有誤，或是迎合時勢曲筆所需，還是其時掌握編輯發稿大權的先生們「以己之意，借汝之名而行」？總之，對這一時期的文史回憶文章，確須對照檔案，比較多種資料後，再予以審慎採納。

對於蔣鼎文不滿蔣介石安排的傳說，至今無法根據檔案資料證明其可信或不足信。不過，有兩點似乎可以說：

其一，據現所見到的檔案資料，蔣鼎文對地方政治是比較淡漠的，在政治乃至軍事權位上，他好像缺少強烈的進取心，甚至可以說比較散淡，上面已經談到了一些，下文將再引述檔案資料做進一步說明。

其二，在戰爭時期，特別是在剿共的緊要關頭，蔣介石不可能把蔣鼎文、衛立煌這種重要的將領放到地方上去處理地方行政事務。至於「官職」，五省剿共北路軍前敵總指揮、東路軍總司令、綏靖主任，那可是具有跨省域、區域的職權，地位凌駕於省主席之上，也比一個省政府主席重要了。戰爭時期的地方文官是不可與武官相提並論的。

閩變平定後，蔣鼎文心情不錯，遊興頗高，他在遊覽廈門名勝鼓浪嶼時寫下了兩首詩，其中一首七絕謂：「劫灰重撥憶朱明，鼓浪潮音警枕醒；四顧茫茫天水碧，神州生氣恃風霆。」這首詩刻在日光岩山頂雨傘亭旁，下有落款：中華民國二十三年，蔣鼎文。

日光岩有眾多名人刻石紀詩，但反映歷史印記的蔡廷鍇題詩與蔣鼎文的另一首岩銘還是格外引人注目。蔡的詩寫於「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後，詩云：「心存隻手補天功，八閩屯兵今古同；當年故壘依然在，日光岩下憶英雄。」可謂詩抒心聲。蔣的《日光岩銘》與蔡詩相距不遠，內容為：「日光岩，石磊磊，環海梯田成玉磊。上有浩浩之天風，下有泱泱之大海。天圍古嶼作湯池，風鼓浪聲助奏凱。天柱不傾海不飛，我銘其崖視億載。」顯係軍事奏捷、躊躇滿志時的豪氣干雲之作。「視接千載」已是英雄，而他還要擴大乘積，口氣上亦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潛赴香港後，都或明或暗地從事反蔣工作。讓蔣鼎文沒有想到的是，李、陳、蔡到香港後，他的同鄉、也是他的黃埔一期學生，在香港任中共華南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宣俠父，策動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還就任同盟會不管部長，以及新十九路軍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師參謀長。更讓蔣鼎文想不到的是，在十五年以後，又是他的小同鄉、共產黨人錢之光（浙江諸暨牌頭鎮人）在香港創辦華潤公司的同時，受毛澤東、周恩來之委託，把他一手趕到香港的李濟深、蔡廷鍇等人，輾轉北上，秘密接到北京，參加新中國政治協商籌備會，李、蔡與毛澤東、朱德、李立三、周恩來等一起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這大概就是人生之「天命」，歷史之輪迴吧。

二、攻佔瑞金，第五次圍剿得逞

當福州克復以後，蔣介石已經有單獨成立「東路軍」的計畫，時間約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然蔣鼎文總是左推右辭，後在蔣介石的軟硬兼施下，遲至二月初才正式上任。蔣把入閩的所有部隊，

連同原駐閩的劉和鼎部均納入蔣鼎文的東路軍，同時委衛立煌出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東路軍的序列如下：¹

東路軍總司令 蔣鼎文

前敵總指揮 衛立煌

第二路軍總指揮 蔣鼎文（兼）

第四縱隊指揮官 李延年

第三師師長 李玉堂

第九師師長 李延年（兼）

第八十三師師長 劉戡

第三十六師師長 宋希濂

第五路軍總指揮 衛立煌（兼）

第十縱隊指揮官 湯恩伯

第四師師長 冷欣

第十師師長 李默庵

第八十八師師長 孫元良

第八十九師師長 王仲廉

1 參見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編》，劉國銘主編：《民國軍政職官人物志》。

第九縱隊司令 劉和鼎

第五十二師師長 盧興邦、盧興榮

第五十六師師長 劉和鼎（兼）

新編十一師師長 周志群

第八十五師師長 謝彬

第八十師師長 陳明仁、陳琪

獨立四十五旅旅長 張鑾基

補充旅旅長 王耀武

總預備隊第二縱隊 王敬久第八十七師

東路軍所配置的十三個師、二個獨立旅，除劉和鼎部幾個師以外，均係中央軍的精銳，約計十五萬人。

稍後，蔣介石又在湖南成立西路軍，由何鍵出任總司令，有十多個師，約十餘萬人。

這樣連同年前成立的北路軍、南路軍，約六十個師，二十多個獨立旅，合計兵力六十餘萬人。

蔣介石已從東南北西四個方面合圍住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紅軍。中央軍主力部隊，除河南劉峙手下還有幾個師以外，其他重要將領、主要嫡系均雲集於此。

當時國內的形勢是這樣的：《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對華北的侵略腳步暫時放緩；北線鄂豫皖、西線湘鄂西，中央軍迫使徐向前的第四方面軍和賀龍的第二軍團撤出原有根據地，進一步向西

退去；為討伐福建十九路軍，蔣介石抽調重兵圍殲，在解決了閩變事件以後，戰略上反而取得主動，紅軍東向的通道被封死，亦即圍攻蘇區西線的門戶已然洞開。

當然，這四面合圍並非鐵桶，除了北、東兩路蔣介石不用擔心外，西、南何鍵、陳濟棠這些部隊不會全聽命於蔣的調動，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利益判斷，對紅軍或戰或和，或放或堵，或追或停，以相應的策略應付，這兩路軍隊的實際表現確亦如此。

蔣鼎文的東路軍司令部設於漳州，其總部班底為：總參謀長李家鼎、總參議兼秘書長張炯、參謀處長陶振武、副官處長邵企雍、經理處長汪柏奇、軍法處長陳逸秋、黨政處長陳逸風、運輸處長蔣伯雄、軍醫處長楊槐堂。部隊多駐防在漳州、龍岩、上杭、永定、新泉、連城一線。其時的任務是積極開通公路，沿途修碉築堡，以層層推進的方式向蘇區重鎮長汀靠近。

陳濟棠南路軍司令部設在韶關，陳時來時不來，他派第一軍餘漢謀的三個師駐守在贛南，目的是堵防紅軍進入粵境；同時又害怕中央軍乘機由贛入境，所部大多駐防於大埔、蕉嶺、平遠、梅縣、興寧一帶。

何鍵西路軍司令部設於宜春，西路軍大多部署在贛江西岸的湘贛、湘鄂贛邊區一側。

顧祝同指揮的北路軍下轄二十五個師和二個旅，人數最多，兵力最強，為這次進剿的主力之一。第五次圍剿的軍事作戰方針是「步步為營、層層築堡、聯以公路、穩紮穩打」，憑仗優勢兵力與紅軍打持久戰、消耗戰。這套作戰方針顯係吸取了蔣鼎文向蔣介石建議的「步步為營、步步推進、堅守到底、決不撤退」的戰法。在政治上，繼續推行第四次圍剿推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在經濟上，嚴密封鎖，嚴禁鹽、糧、藥及煤油等物資流入蘇區，企圖斷絕

蘇區與外界的一切物資交流。

然而以王明路線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根據李德的建議，採取以堡壘對堡壘，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處處設防，處處抵抗，與國民黨中央軍打正面戰、打持久戰。這種戰法正好中了中央軍進剿部隊「步步為營、築碉建堡」的陷阱，從而使紅軍逐漸喪失主動權，陷入了被動挨打境地。

由於北路軍與東路軍兩支主力已聯成一片，蔣介石可以根據戰情有分有合地使用。

東路軍方面，蔣鼎文的任務實也繁重。

第一，根據蔣介石的總體部署，分區域出擊蘇區紅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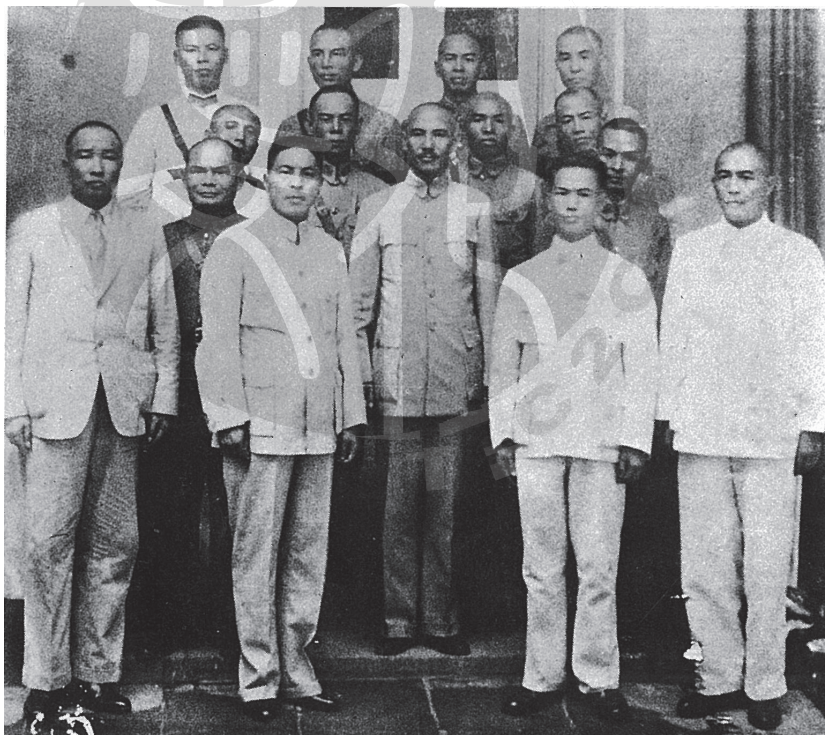
第二，要南下廣東，與粵軍作多方位溝通。其時兩廣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實際上還處於半獨立狀態，他們與蔣介石有尖銳的矛盾衝突，又害怕紅軍進入粵、桂；陳濟棠雖任南路軍總司令，然對剿共，總是根據自身利益出發來掌握分寸，並非完全聽命於南京中央政府調遣，更微妙的是西路軍總司令何鍵與兩廣關係曖昧，有時他們的行動互相配合，共同以明攻暗守的方式來敷衍蔣介石。對此情況，蔣介石豈能不曉，因而他多次與蔣鼎文商定如何籠住陳濟棠這頭野馬，以堅定他的剿共決心。蔣介石在規定南路軍的軍事進度同時，又要蔣鼎文向陳濟棠面告整個圍剿計畫，以打消陳未便明言的疑慮。蔣鼎文於二月十日、二月十四日、二月底、三月三日，四次入粵會商陳濟棠¹，做起了「軍事外交家」的角色。

1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軍事進攻方面，蔣介石於二月下旬給蔣鼎文、衛立煌下達命令：「第三、第九師於本月杪集中漳州，準備下月東（一）日由漳州向龍岩前進，預定於（六）日到達龍岩城為要。」¹

為打破蔣軍的圍剿，使中央蘇區與贛浙閩蘇區聯成一塊，朱德、周恩來指揮紅軍一、三、五等軍團繼攻佔沙縣、永安後，又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下旬發起泰寧戰役，與駐紮在此的東路軍湯恩伯部激戰七天。蔣鼎文令湯部殊死抵抗，不得退卻，又調兵遣將增援湯，紅軍估計目的難以達到，乃作罷。

至三月底，蔣介石對各路軍隊



一九三三年蔣鼎文於廬山訓練團與蔣中正（中）合影

1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二〇頁。

下達對中央蘇區分進圍剿出擊的命令。

顧祝同指揮北路軍，轄羅卓英、樊崧甫、吳奇偉、劉紹先、周渾元等中央軍及孫連仲、張鈞等北方軍計二十五個多師的兵力，從黎川、宜黃、永豐、泰和分兩路南下攻取廣昌、石城、興國、寧都。

蔣鼎文指揮的東路軍有李延年、衛立煌、湯恩伯、劉和鼎四個縱隊十五個師，除劉和鼎留下部分師旅留駐閩北、閩中各城以外，其餘部隊均向閩西出擊，這是除北路軍以外，圍攻閩贛蘇區的一支最重要武裝。

陳濟棠的南路軍指揮余漢謀等部，約計九個師，嚴密佈防於贛閩粵邊之地，武力圍堵蘇區紅軍南下。

何鍵的西路軍指揮劉建緒、陳繼承、梁冠英等部，約計十四個師在贛江西岸向湘鄂贛、湘贛邊區進攻。

為協同北路軍於四月十八日發起的廣昌戰役，蔣介石電令東路軍在東線發動進攻，蔣鼎文於是作出如下軍事部署：

劉和鼎縱隊守備建陽、建甌、順昌、延平、永安、沙縣一帶，這幾個師一方面確保向閩西進攻方向之交通暢通和物資安全，一方面加緊修築碉堡和公路。

李延年縱隊由閩西南的漳平、龍岩出發，攻取連城，建立閩贛邊境封鎖線，這一路是戰鬥突擊部隊。

湯恩伯縱隊也是戰鬥突擊隊，該部從閩西北及閩中的順昌、邵武出動，攻取將樂、泰寧後以奪取建寧。湯部在四月上旬的任務主要是在將樂、泰寧一線修建公路，開築碉堡。

四月二十八日，北路軍攻下廣昌後，蔣介石令周渾元部從贛東開入閩境，由東路軍前敵總指揮衛立煌統一指揮湯、周兩縱，以六個師兵力進攻建寧，與朱德、周恩來指揮的林彪、董振堂、羅炳輝三個軍團激戰。終因蔣軍炮火猛烈，建寧在十六日被東路軍孫元良八十八師攻陷。

稍後，李延年縱隊與張鼎丞、周建屏等二十四師所部激戰後亦得手，在繼攻克新泉、朋口後，又於六月一日攻下連城，直逼紅軍蘇區東端門戶長汀。

廣昌、建寧兩役的失利，使中央蘇區的紅軍極為被動。紅軍乃命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在贛閩邊境通過清流、渡過沙溪，向福建腹地東進，目的是調移李延年部向蘇區包圍的兵力。

六月上旬還有一戰，即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將駐守福州西側水口一個師擅自調往閩東，福州防務空虛，紅軍羅炳輝得知軍情，乃率部快速向東逼近福州，陳儀趕忙向蔣鼎文告急。由於事前蔣未知水口守軍東調，乃急飛赴福州，就近調集各部與羅炳輝奇襲軍激戰，羅部知難而退。

陳明仁率領的第八十師則在沙縣失利，這位以後聲譽卓著的名將，在與紅軍作戰中，傷亡慘重，輜重損失殆盡，引起了蔣鼎文的震怒和蔣介石的不滿。加之吃空餉、拒調遣等因素，蔣介石遂撤去陳明仁師長之職，調他到廬山軍官訓練團受訓，並把時在蔣介石侍衛室任少將參謀的陳琪，也是陳明仁的黃埔一期同學，調來接任第八十師師長之職。

蔣介石為集中兵力進犯蘇區，在五月十六日攻下建寧以後，略作調整，把東路軍湯恩伯縱隊歸入陳誠第三路軍指揮，又將原調往東線作戰的周渾元縱隊重新編入西線薛岳的第六路軍序列。

蔣介石對北路軍、東路軍的推進方法，始終貫徹著加緊築路、修築碉堡、逐城攻克，向中央蘇區核心區域層層推進的方針。五月一日蔣介石給蔣鼎文發去一電：「廣昌既已占領，此後朱匪主力

必向東路襲擊，望迅將舊縣與新泉碉堡線完成後，抽調各師主力速築龍岩到新泉公路，完成後再向連城逐步推進，故此時進展不必過急，但龍新公路務趁此半月工夫限五月三十日完成通車。各師築路部隊應分段定時與工程期限，皆應由總部負責規定令行，並隨時監理毋使延誤。」¹其時，凡駐軍除防務外，均一律參加築路，以軍工為主，民工副之，利用戰時政策，迫使民工協力完成。

由於湯恩伯縱隊其時歸入北路軍序列，再加尋淮洲的紅軍所部向福建腹地突進，進而威脅福州，蔣鼎文兵力頓感緊張，於是命王敬久加強福州防守，同時又請蔣介石調入原從十九路軍改編而來的伍誠仁、文朝籍兩個師及王耀武的補充旅，以加固城防，亦避免東路軍後方被襲。

衛立煌指揮劉和鼎的五個師，守備閩北、閩中的沙縣、永安地區。

李延年已抵中央蘇區核心週邊，由於兵力不足，難以展開，只得固守已經取得的閩西幾個縣城，以配合蔣介石各路大軍圍攻蘇區。

經過五、六、七這三個月的開通路網、築碉修堡，逐步攻佔城池，蔣介石認為最後圍攻蘇區的時機已經成熟，乃作出具體進攻部署，並於八月中下旬下達命令：

北路軍陳誠的第三路、周渾元的第八縱隊為進攻寧都、石城地區突擊部隊，吳奇偉的第七縱隊作輔助性進攻。

東路軍李延年縱隊四個師負責進攻中央蘇區的東南側背，即攻擊石城之南的長汀地區。為方便指揮，東路軍總司令部由漳州移至龍岩。

東路軍攻擊長汀各部集結方位為：李延年的第九師在朋口以東；李玉堂的第三師在朋口以西；

1 轉引何虎生：《蔣介石傳》（上），華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二六六頁。

李默庵的第十師在龍岩至新泉一線；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師在新泉附近地區；陳琪的八十師從永安推進到龍岩地區；炮兵團、汽車團到達朋口一帶待命。

各部到達後，蔣鼎文召集進攻部隊營長以上官員開會，強調這次進攻長汀地區的重要性，同時作出戰鬥部署：

一、第三師、第九師、炮兵團（欠一營）及通訊兵的一個營，統歸第九師師長李延年指揮，擔任進攻白衣洋嶺共軍主陣地的任務。

二、第三十六師主力集結新泉附近，擔任左側的警戒，並派出小部隊向新泉以西一帶進行武力搜索。

三、第十師擔任新泉、龍岩間地區的戒備，防止共軍破壞我交通和運輸。

四、第八十三師主力集結於連城，擔任右側的警戒，並派一部向連城以西地區進行活動。

五、福建省保安第十團接替第十師上杭、永定的防務，右與三十六師聯繫，防止共軍竄擾我側背。

六、第八十師擔任龍岩的守備，並負責維護龍岩、漳州間公路的安全。

東路軍第三、第九師集結在朋口東西兩側。朋口為連城縣的一個鎮，朋口西部有一座叫松毛嶺的大山，因多生松木，林深葉茂，故名。松毛嶺南北縱向八十多華里，東西寬為三十多華里，是與長汀交接在一起的高山，山嶺綿延，峰巒險峻，為中央蘇區瑞金的一道天然屏障。越過此山向西，則地勢平緩有度，已無險峰高山，攻下長汀較易，如長汀這個東大門一下，近在咫尺的蘇區首府瑞金就難以據守。故而紅軍在此投入重兵，林彪的紅一軍團、羅炳輝的紅九軍團、周建屏的紅二十四師在松毛嶺的東西兩側設防固守。

松毛嶺成了兩軍攻守轉換必然要重兵爭奪的戰略要地。

當李玉堂第三師接到任務後，就由第八旅旅長許永相於九月一日率部開到坐落於白衣洋嶺（屬松毛嶺）的溫（文）坊，為攻擊做準備。

許永相所部對紅軍沒有足夠的警惕性，僅按常規布下幾個崗哨，未巡視所處環境和紅軍動向就安然進入夢鄉。

當許永相進入溫坊之時，林彪的紅一軍團、羅炳輝的紅九軍團、周建屏的紅二十四師正在南山、童坊一線，見如此有利戰機出現，迅速集中部隊一萬五千餘人，於晚間對許旅發起突然攻擊。不到幾個小時，就把許旅擊潰。許永相急向蔣鼎文求救，蔣命李延年率第九師馳援，始把許旅殘部接回，但李的第九師也遭受損失。許永相則乘夜色掩護，隻身得以出逃。

大戰尚未開打即損兵折將，且是嚴重喪失警惕性引起。蔣介石在南昌得報後，極為震怒。下令拘捕許永相交軍法處嚴辦；將第三師師長李玉堂由中將降為上校，革職留任，同時對蔣鼎文、李延年亦嚴詞斥責。

許永相是浙江諸暨王家井樓許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任學校總隊部中尉區隊長，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副連長、營黨代表、營長、憲兵團參謀長，第二十六師獨立一旅少將旅長，第三師第八旅旅長等職。

東路軍兵力本來就不足，在攻擊作戰部署搭箭上弦之時，又導致如此重大損失，這在蔣介石看來是罪不可恕，乃電令將許永相押解南昌行營究辦。其時，總司令部與許永相私交相深人士慫恿許在押解途中見機脫逃，以待日後發展，並援引孫元良事例。乃北伐初始時，孫元良於江西戰役中失

利，引起蔣介石憤怒，若交給軍法官辦，定是死罪，而孫在扣解途中設法出逃，越年後，孫戴罪復官，如今已東山再起。然耿直的許永相認為軍人做事要敢作敢當、光明磊落，不屑中途脫逃，並自信滿滿，認為只要見到校長，將失利的前因後果稟明，蔣校長定能體察其時處境，可免一死。然事與願違，當其押解到南昌，未能見到校長，即被軍法處決。許旅之敗，還有一說是師長李玉堂嚴重誤傳命令，導致重大失利，事後又推諉於許，致使其當了替罪羔羊，故而對李作降兩級、革職留任的處分，已是大事化小了。

李延年部進攻受阻，李玉堂師又遭紅軍突襲受損，西向長汀攻擊未能如期，蔣介石認為東路軍進展遲緩，乃將顧祝同傳喚至廬山，讓他帶郭懺、韓德勤這些參謀作戰人才飛至龍岩，與蔣鼎文再度會商西攻長汀部署。

顧祝同帶著北路軍司令部參謀長韓德勤、前敵司令部參謀長郭懺，銜蔣介石之命前往。蔣鼎文與顧祝同的公誼私交自不必多說，而對於這兩位參謀長，蔣鼎文亦均是熟稔。

韓德勤是江蘇泗陽人，與顧祝同是同鄉，屢受顧提拔袒護。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旬，韓德勤所率第五十二師被紅三軍團圍殲，經蔣鼎文第九師奮力回救，殘部得存。韓機警地化裝成伙夫得以從紅軍俘虜營中逃出。未久，便應顧祝同之邀，出任江蘇省政府委員、省保安處長一職。顧辭去江蘇省主席以後，出任北路軍總司令，就將同時辭去職務的韓德勤調至總司令部任參謀長。

對於同鄉郭懺，蔣鼎文當然是更熟悉了。郭自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一直在浙軍供職，周鳳岐被蔣介石逼退辭職後，郭因與周是連襟關係，亦辭去軍職。但郭有良好的軍事素養，多謀善斷，作風嚴謹，為二十六軍繼任軍長陳焯挽留，呈請軍委會批准，任郭為該軍少將參謀長。據說何應欽對郭

還是不太放心，認為郭究係周鳳岐連襟，而周對蔣又懷恨在心，伺機反蔣，因而囑時任北伐第一路總司令劉峙注意郭的行動。劉將此資訊告訴蔣鼎文，蔣乃囑郭辭去軍職。郭遂以出國留學為名暫離軍隊，實是閒居上海。

陳誠與郭懌同畢業於保定軍校炮科，比郭懌晚兩期，也許是同一專業，也許是同鄉之故，陳對郭的學養、為人極為賞識，力邀郭出任其第十八軍少將參議。一九三三年初，陳誠在蔣介石的批准下擴充部隊，從第十八軍中又分出了第五軍，由保定同期同科同學羅卓英出任軍長，郭懌出任軍參謀長，為第四次「圍剿」紅軍的主力部隊。時陳誠任中路軍總指揮，參謀長為郭思演，當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被紅軍俘獲後，陳誠將郭思演調至五十九師任師長，而中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則調郭懌出任。當東路軍從北路軍分出後，蔣鼎文的前敵總指揮之職由陳誠繼任，陳又調郭懌出任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郭成為落實陳誠戰略戰術意圖最重要的助手。自此後，郭懌一直是陳的左臂右膀，直至一九四七年出任聯勤總司令。

這次入閩，蔣介石讓顧祝同帶著韓德勤、郭懌到蔣鼎文處會商作戰部署確是頗具深意的。

這裡還有一個插曲，此次顧祝同赴龍岩時，因飛機故障迫降之故，顧在宋希濂的新泉司令部住了一晚上，因宋是顧的老部下，故而顧祝同對宋有一番重要的談話。宋是這樣回憶的：

福建事變的迅速平定，把十九路軍消滅得這樣澈底，是始料不及的。這個問題的迅速解決，扭轉了整個局勢。我軍的有力部隊進駐閩西，和北路軍聯成一氣，共軍竄往皖浙蘇的可能性減少了；而且縮小了對共軍的包圍圈，這一形勢對我們是有利的。現我軍把重兵放在北路和東路，

採取穩紮穩打、逐步前進的辦法。第一步先攻下寧都、長汀，然後再進取瑞金、興國，壓迫共軍於贛江而消滅之。這是我們的作戰目的。¹

顧、蔣等會商後，根據紅軍的動向又作了攻擊調整。其中第三師新敗，實力受損，士氣受挫，已不可能完成原受任務，乃把主攻松毛嶺之白衣洋嶺任務交由宋希濂的三十六師擔任，由李延年的第九師作配合攻擊。

其時因興國戰況緊急，紅一軍團已撤出松毛嶺白衣洋嶺防地，西向馳援而去，固守此山的為紅九軍團和紅二十四師。

三十六師和第九師經過周密部署，並由毛邦初指揮空軍九架飛機輪番轟炸紅軍陣地，經過近一天的激戰，紅軍不支撤退。九月二十七日宋師攻占白衣洋嶺主峰。宋希濂在視察陣地時被紅軍機槍排彈擊中，身受重傷，由此退出戰鬥，直至一九三五年五月傷癒，才回到長汀三十六師師部復職。

主峰失守後，堅守其他陣地的紅軍依然逐次阻擊蔣部。至九月二十九日傍晚，第九師、第三十六師又占領了大園山、大洋山等各處高峰，松毛嶺終被東路軍全部占領。紅軍退守到長汀縣鐘屋村。

蔣鼎文部乃急忙構築防禦工事，以防紅軍去而復來。占此要津以後，通往長汀之路亦就指日可通。蔣介石時刻關注著戰局進展，他於九月二十七日、九月三十日連續電告蔣鼎文和顧祝同，在占

¹ 宋希濂：《鷹犬將軍》，第九五頁。關於顧祝同到龍岩蔣鼎文部會商作戰計畫之事，宋希濂說是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而顧祝同《默三自述》說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兩者所述均為西曆，何故時間相差一個月，待考。

領溫坊以西高地以後，應趁機拿下河田，以符合戰略攻勢之原則。十月一日又電告，如要直接向西進擊，務應沿途修築碉堡。¹

然東路軍進攻兵力仍感單薄，蔣介石覺得欲儘早結束圍剿之役，須從北路軍調兵過來，充實攻擊隊伍。為此，他於十月九日提出兩套調兵方案，電告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陳誠：

欲促進戰局之以早結束，則東路應增加兵力，如能將第四與八十九兩師由湯帶領東移，則東路即可單獨向長汀、瑞金進展，一面北路軍占領寧都與薛路會合後，即可由寧都與東路軍由長汀會占瑞金，可免石城與長汀線之兵力與時間也。如該兩師不便調往，則調第八與八十八兩師亦可，而現駐資金溪之一師，屆時仍可調回廣昌以南地區也。²

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蘇區首府瑞金週邊的興國、寧都、石城、會昌相繼陷落。中央蘇區只剩下瑞金、雩都、長汀、寧化等狹小地盤，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遂於十月十日作出決定：留下項英、陳毅率紅二十四師及地方部隊兩萬餘人留守江西，由博古、洛甫、周恩來、朱德等率中央紅軍主力八萬餘人突圍長征。

十一月一日，東路軍李延年第四縱隊攻下長汀。

1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2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二三頁。

十一月六日，蔣鼎文的東路軍總司令部給李延年發出電令：

著該縱隊副指揮官李默庵率第十、第三十六師進取瑞金，於八日集結長汀，即一舉占領瑞金之目的，於九日晨開始攻擊前進，限當日占領古城，十日占領瑞金。仰遵辦具報。¹

中央紅軍對軍事形勢的判斷還算明智，決意避開東路軍鋒芒，主力部隊在八日這一天就退出瑞金，西走至雩都。

李默庵率兩師按東路軍總司令部命令限時實施，終在十一月十日占領中共悉心經營了七年的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事實上，其時的瑞金也基本上是一座空城了。然蔣鼎文要求所部重點清查共產黨及其辦公場所的往來檔檔案。

能夠首先攻克國民黨軍夢寐以求的中央紅軍首府瑞金，無論在東路軍還是北路軍看來都是值得誇耀的資本，都是首記大功的戰績，他們都要往臉上貼金，即使是時任北路軍總司令的顧祝同亦未能倖免，他在《墨三九十自述》中如此記述：「北路軍第三路軍收復瑞金，東路軍收復會昌。」至於《民國上將湯恩伯》一書則時序搞錯：「十一月十日，湯恩伯率部占領了瑞金。」而一位對湯恩伯有所研究的線民「白馬嘯西風」也說：「第五次圍剿時，湯恩伯更是第一支進入瑞金的部隊。」

對於這個問題，被臺灣奉為官方史書、由郭廷以主編的《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依據檔案資料，

¹ 轉引金一南：《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九九頁。

不認同顧祝同之說，該書如此記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東路軍剿匪第四縱隊（李延年）第十師李默庵收復江西瑞金。」

攻佔瑞金的東路軍第十師師長李默庵在《世紀之履——李默庵回憶錄》中如此記述：「梅口之戰後，我第十師繼續南下，經過長汀，於十一月十日率先進占紅軍中央根據地的中心區——瑞金。我是在中午時分自城西進入瑞金的。瑞金城外的土坪上，堆積著百餘具屍體。城裡，房屋被拆毀，戶疏人稀，蕭條冷落。此時紅軍已經全部撤出，當地百姓以極為陌生的眼光打量著我們這支部隊。我即下令迅速查清瑞金附近紅軍情況，並安排部隊休整。不幾日，便奉命撤出瑞金。」

時任北路軍總部特務團少將團長，也是顧祝同、陳誠屬下的戰將宋瑞珂曾有文章發表：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由於紅軍撤出，陳（誠）軍便進佔寧都、雩都，李默庵師（東路軍）也進入瑞金。陳誠命湯恩伯縱隊（時歸北路軍指揮）到瑞金接替李默庵師防務」。¹

根據當時戰場電報及綜合各種資料則不難明白：對於瑞金，東路軍是「首先攻占，北路軍是「後續接防」。

長汀、瑞金這兩個紅色根據地的重鎮，就這樣被東路軍一步一步攻占，蔣鼎文剿共戰功又添上濃重的一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終於成功。

三、福建「綏靖」，收編地方武裝

1 宋瑞珂：《陳誠及其軍事集團的興起和沒落》，《中華文史資料庫》第二卷第五四九頁。

蔣鼎文的東路軍在攻佔瑞金的過程中，一個意外的收穫是搞清了紅軍突圍的真正去向。原來蔣介石以為，紅軍已擠迫在閩西贛南的區區幾縣之內，動彈不得，在長汀、瑞金一帶包圍消滅他們只是時間而已，於是他偕宋美齡北上到各地視察。及至十月中旬，紅軍毅然捨棄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向西突圍而出，先頭部隊速抵桃江。蔣介石得報，急忙飛返南昌行營，但他和他的幕僚們怎麼樣分析都搞不明白紅軍此次左沖右突的真實意圖。

蔣介石據蔣鼎文所報送的，從瑞金繳獲的大量中共檔資料中分析判斷，這次紅軍不是戰術機動，而是戰略轉移；方向不是南下，而是向西。為此，蔣介石以十萬火急的電令告知各部堵追攔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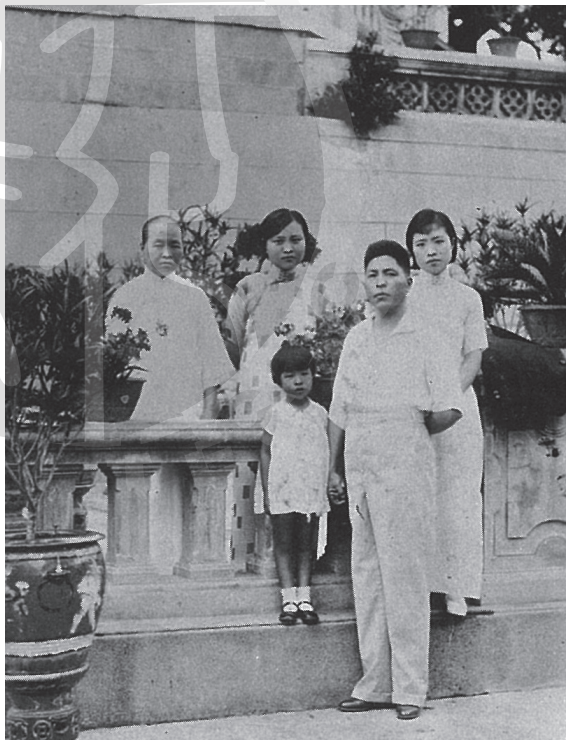
在此後的幾天裡，中央紅軍從信豐至贛縣之間五十公里的正面向西大規模突圍。二十六日，蔣介石命薛岳、周渾元兩個縱隊緊追紅軍。旋又發電給蔣鼎文、顧祝同、陳誠以及陳濟棠、白崇禧、何鍵共同圍殲突圍而出的紅軍部隊。當紅軍西進意圖證實後，又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薛岳為追剿軍前敵總指揮。

由於紅軍的真正指向是由贛入湘，而不是南下兩粵，致使地處閩贛的蔣鼎文東路軍壓力減輕，顧祝同的北路軍亦然。故而，蔣介石令追擊圍堵紅軍的任務主要由西、南兩路軍抽調部隊去完成。在蔣介石看來，贛閩兩地主力紅軍西去，則兩地的圍剿任務已經基本告竣，於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行政院下令，撤銷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共各總部及東西南北各路軍總司令。蔣鼎文、顧祝同改任「駐閩綏靖區」主任和「駐贛綏靖區」主任。

一九三五年一月，蔣鼎文正式上任福建綏靖區主任。綏靖區與東路軍的任務側重有所不同，更多的是把重心放到綏靖地方上來了。綏靖公署剛開始設在漳州，後遷移到建甌。綏署的班底與東路

軍總部時略有調整。總部參謀長李家鼎一度調任福建省保安處長，參謀長一職由趙南接任，其餘的人員除稱呼有所更改外，實質均未變動。蔣鼎文的幕僚們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浙江講武堂出身的李家鼎、邵企雍、馮熾中、楊逸軒等；另一是浙江或諸暨人為主的軍政人員，如張炯、張競遠、汪奇柏、陳逸秋、陳逸風、楊槐堂、蔣伯雄等。福建全省分四個綏靖分區，分別駐紮在福州、建甌、漳州、龍岩等地。

東路軍和福建綏靖區時期的所屬師長、旅長及綏靖分區主任多係黃埔軍校一期、保定軍官學校及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當時一度歸屬蔣鼎文指揮的有張治中、衛立煌、湯恩伯、陶峙岳等資歷較深的將軍，也有李延年、李默庵、李玉堂、甘麗初、陳明仁、陳琪、冷欣、劉戡、宋希濂、王敬久、孫元良、陳沛、楊步飛、許永相、陳德法等黃埔一期畢業生以及黃埔三期的後起之秀王繼祥、王耀武等人。其中諸暨籍的將領有陳琪、楊步飛、許永相、陳德法、王繼祥等。後王繼祥與陳琪不睦，經蔣鼎文與顧祝同商議後，將時在顧手下的何凌霄（黃埔二期，諸暨籍）與王繼祥對調，以協調將



一九三四年蔣鼎文一家於鼓浪嶼合影

領之間的關係。

福建與廣東兩省聯繫緊密，一地有動，兩相呼應。民國初年，孫中山宣導革命，多在兩處奔走，特別是護法之役開始後，孫中山號召民間組織軍隊，以作擴充革命武裝之用。同時，孫以自己的名義下了許多委任狀，可謂山頭林立，司令、軍長雜陳。內戰紛繁，中央政府自顧不暇，這些地方武裝囂聚一方，割地自雄，已呈尾大不掉之勢。他們或私設關卡，收取捐稅；或各自為政，驅逐中央政府所派人員。剿共之時，蔣介石哪有精力他顧。但當他認為福建已為中央政府所控制之時，就必須集中解決這批亦匪亦民的武裝，以綏靖地方。

為此，蔣介石把陳儀和蔣鼎文叫去，商量如何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蔣介石說：「銘三，你是福建通。我們兩人當年相識還是在福建長泰，不想已近二十年了。對於福建的歷史和現狀，你比我還瞭解。今天先想聽聽你對這個頑疾治理有什麼好的計策。」

蔣介石所說並非虛言，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四年入黃埔軍校之前，蔣鼎文多奔波在閩粵兩地，策反浙軍投誠粵軍，帶領粵軍北攻閩境，特別是在孫中山護法政府軍任職時，蔣鼎文奉孫中山之命與這批地方武裝首領有密切的合作，與這批「司令們」推杯論交，呼朋為友。當他們得知中央派蔣鼎文來閩治理後，無不擊掌相向，因為他們認為蔣鼎文不會為難他們，知道他們曾經幫助過孫中山鬧過革命，知道他們的任命是孫中山發的委任狀。

遵蔣介石之囑，蔣鼎文陳述了自己的主張：

總理在護法時為了擴充武力而利用這一班人，這班人當中的雖非善良之輩，但也有熱心愛國愛黨之士，不能一概而論。不管怎樣，他們都曾接受過總理正式的委任狀，我們今天奉總理為國父，

我們不能在國父逝世後對於他委派的官職一概不予承認。而且這一班人在地方上有著他們個人深厚的勢力，與西南的不穩份子或北方殘餘軍閥也有互通聲氣，如果我們以武力解決他們，地方將受糜爛，他們可能變成一股土匪深入山區，如此，清剿更為不易。」

說到這裡，蔣鼎文看了看蔣介石，見他神情貫注在聽他敘說，沒有一絲厭煩的樣子，於是繼續道：「我主張先撫後剿，對總理所委任的官銜一律承認，使得他們面子上過得去，告訴他們現在國家平靖，以前的番號不再適用，而且國家正要建設，沒有辦法養育龐大的兵員，對他們只能編成地方保安團隊。為了整編他們，就要成立編練處，施行編組訓練，讓他們平時保衛地方，戰時動員可成國軍勁旅。既編之後，一切非法的設卡徵稅和擾民行動一律停止，否則依照軍法究辦。對以往的非法人行為概不追究，以開其自新之門。凡不受撫招，我認為當屬少數，對於不接受編訓，則再行進剿，並還准其隨時招安，我想這是最好的辦法。」

陳儀是個老官僚、老江湖，他一面聽著蔣鼎文的意見，一面更多關注的是蔣介石的表情。見蔣聽得入神入味，且不時點頭表示贊同，他已知蔣介石贊成這種「先撫後剿」的策略，便趕忙表態說：「對於銘三主任的看法我亦贊同，難題是要招撫這麼許多地方武裝，工作量之大自不用說，當然這自是銘三主任會努力完成，但要命的是福建的財政緊得很，我們負擔不起啊！」

陳儀的算盤打得很緊，或撫或剿均是你綏靖部隊的職責，但若軍費開支要落實到省政府頭上，我們是無力解決的。

蔣介石已知兩者之間的同異之處。對於蔣鼎文所講的淵源和解決的思路他都贊成，陳儀所講省財政開支困難亦是實情，確實，這些年來福建干戈攘擾，沒有安定過。於是他表了態：

「對地方武裝的收編就按銘三所說的做，經過整編而成的保安團的給養由中央負責解決，我會告訴財政部按實際需要撥給福建。」

大政方針定下以後，蔣鼎文便著手招撫收編工作。地方武裝的首領們早知道蔣鼎文出任綏靖司令，他們紛紛向蔣鼎文表態，願聽命於政府的收編、蔣司令的安排。也有地方武裝拒不接受收編，這時候綏靖區的部隊就施加武力。當時駐紮在安溪、華封縣境內的詹方珍一支，兵力約一個團的規模，蔣部屢次發檄就是不予理睬，直到以共同「清鄉」為名讓其配合，才不得不同行。蔣鼎文把這支地方武裝調出其發家之地，讓他們到達漳浦與正規軍同行同住。蔣鼎文下達密令，讓陳琪師王繼祥旅負責將其全部繳械。大規模的武裝繳械，完全有可能激起反抗，甚至連鎖反應，為此當天漳浦所有的通訊線路、電線電話以及汽車、自行車乃至行人全部不准進出，杜絕走漏任何消息。詹方珍被捕後曾趁亂逃出，但即被亂槍射殺。

還有一種說法，詹方珍是傾向、同情共產黨的地方武裝，他不接受國民黨的收編，是想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以便找到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然紅軍西撤後，他像根斷線的風箏，失去了目標，故而遭到蔣鼎文部的強行圍殲。

蔣鼎文的綏署軍政齊下，軟硬兼施，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在福建全省收編了十八個保安團，過去所謂的「民軍」，就這樣全部編到了省保安團的名下，任務是「清鄉」、「剿共」、「保境」。比較著名的有葉定國、陳佩玉、葉文龍的保安團及抓獲瞿秋白的鍾紹葵第十四保安團等。

對於這一成功「招撫」，蔣鼎文頗為自得。他在三十多年後還回憶這一功績：我把「他們編成保安團隊，經過一番整頓訓練，都變成軍風紀律嚴明的保安團，維護桑梓。由於治安良好，民間沒

有苛擾，政府的政令連僻壤之地皆能到達，多年未曾返鄉的僑胞亦紛紛歸來掃墓、與族人團聚，並且帶回大批的僑資來建設地方，行旅安於途，農夫安心耕作，福建的建設一日千里。如果我在福建算有建樹的話，便是不曾使地方受到戰爭的禍害，更救平了多少年來為禍熾烈的土匪，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¹國民黨中央對蔣鼎文這一高明且忍耐力甚足的「招安」也讚賞有加。

由於收編了不法武裝、散兵游勇，地方治安逐漸好轉，華僑紛紛回鄉，以至惠安縣不少涼亭有頌揚蔣鼎文功績的碑文出現。

陳儀對此很不以為然，然亦莫可奈何。作為地方政府首腦，又因未能解決糧食問題，導致福建饑荒，當地民眾以春秋陳國糧荒之典故，諷喻「陳儀在閩，閩人在陳」。這一民謠一時風傳「八閩」大地，陳儀可謂焦頭爛額。

其實從蔣介石的角度看，把陳儀放到福建省主席這一位置上，是任得其所，因為在從政資歷上，陳儀可算不二人選。

陳儀，浙江紹興人，字公俠、公洽，號退素，一八八三年出生。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炮科第五期，歸國後先在陸軍部任職，一九一二年被時任浙江都督蔣尊簋聘為浙江都督府軍政司長，後任浙軍第一師師長、第一軍司令官，亦出任過孫傳芳時期的浙江省省長。北伐時陳儀歸順國民政府，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兵役署署長、常務次長、代理部長、軍委會第二廳廳長等職。陳儀曾傾力資助提攜湯恩伯，兩人關係至為密切，視同父子。時人曾有評價：陳儀既因湯恩伯相得益彰，亦因湯恩伯出賣長官而丟掉性命，當然這是後話。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四—四五頁。

蔣鼎文說，東路軍使命完成以後，「委員長應陳儀之請，要我擔任福建綏靖主任，專門負責福建方面軍事」¹。當然，這種「之請」，如果不對蔣介石的思路，那麼「再三之請」也是不可能任命的。陳儀比蔣鼎文年長一輩，他們結識於杭州，時蔣鼎文還是一個軍校學生。他們在蔣尊簋府上相識，蔣鼎文覺得陳儀有點恃老自居。但他還是尊重陳儀的，凡事也多聽他的意見。蔣鼎文繼續回憶道：

陳儀本人自恃有才，為人十分專橫，他與蔣百器先生是同代人物，因為這種關係，我十分尊敬他，稱他為「公俠先生」，他漢文基礎很好，有才幹，就是跋扈。我在福建綏靖公署任內為了顧全大體，凡事遷就他、成全他，從來沒有把他在福建的劣跡向委員長提過一次，怕別人批評我想當福建省政府主席，怕與陳公俠之間發生嫌隙，影響團結。我對於政治很淡泊，其實我到福建擔任綏靖主任，條件就是不兼任省府主席，我把福建的軍事整頓就緒，全部交給陳儀，便去陝西。²

一個主政，一個主軍，兩個人在福建任內由於共同的階級利益所致，在諸多方面還是配合默契，譬如在清鄉剿共、封鎖蘇區、編練民軍、趕築公路、禁煙禁毒等方面，他們步調一致。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二—四三頁。

2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五頁。

不過在配合時，他們又從各自的職位考慮，發生過不少爭執。還在東路軍時期，為進攻長汀、瑞金，開築路網、層層推進是軍隊的重大任務之一，而所加派之民工，又要通過地方政府去徵召，如果不能按軍事進度完成，那麼地方上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按照計畫，蔣鼎文迭電陳儀，要求陳儀的省府凡在軍隊所過縣份要供應充足的民工，尤其是靠近瑞金的長汀、寧化、連城、清流等縣。陳儀老於世故，對這些電報自然心中有數，然礙於軍事進剿的壓力，又不敢置之不理，徵召難度再大也要配合，可有時量大，一時實難完成。故而陳儀與蔣鼎文多次電商：關於詔安、漳浦、雲霄、平和、泉州、永定、連城、長汀、寧化、清流等縣縣長，概由蔣鼎文司令委薦，事後由省府加委，理由是戰亂時期，軍事優先，民事手續補辦。於是蔣鼎文就將副官處長邵企雍派充龍岩專員兼區保安司令，黨政處長陳逸風派充浦城專員兼區保安司令並兼縣長；陶振武、章錫珍、李寅樞等則分任思明、同安、龍溪等縣縣長，於是建礪修堡、開山築路的民工問題就以這樣的方式解決了。

蔣鼎文還將龍溪縣長換成自己講武堂同學、溫州籍的陳志遠，將石馬稅務局局長換上他的堂弟蔣鼎梅，將綏署經理處的科長蔡松時派至漳州稅務局當局長，派副官處科長姚崇岳為崇安縣縣長。這一系列的任命，在手續上當然通過省政府，可陳儀心中實有不甘。所以，一旦找準合適時機，尤在戰亂稍平之時，陳儀還是以各種方法，利用自己的合法平臺將蔣鼎文舉薦的地方官員或免職，或他調，特別是蔣鼎文離開福建、陳儀繼任福建綏署主任之後，更是開了殺戒。這點蔣鼎文在日後的回憶中也提到：我到陝西後，「有一次接到福建地方人士的電報說，整編過來的一個團長因為一點小事被陳公俠看管起來，我知道這位團長並不是壞人，福建人士來電請我向陳儀說情保他出來，我

拍了一封急電給陳儀，後來這個團長還是給他槍斃了」¹。

顯然，陳儀這是殺雞儆猴，如今蔣鼎文已遠調陝西，你們的後臺已鞭長莫及。

人生之事難測，想不到十五年後，這兩個當年的同事、同府所屬的小同鄉，又因為階級利益所致，在生死的分界線上陰陽永別。

蔣鼎文在駐閩綏署的任上又適逢陳濟棠發動倒蔣的「兩廣事變」。根據蔣介石的安排，蔣鼎文將綏署移至建甌，並迅速調集軍隊，準備對廣東發起攻擊。後兩廣事變和平解決，為解除粵方的顧慮，蔣介石讓蔣鼎文所部從閩粵邊境撤離。

四、抓捕槍殺瞿秋白

紅軍長征以後，留在贛閩邊界的只有項英、陳毅等少數紅軍武裝，且全部轉入地下，開展遊擊作戰，其時的艱難困苦、危險處境可以想像。蔣鼎文駐閩綏靖處、顧祝同駐贛綏靖處的一大任務是「肅清這些共匪武裝」，因而要逐月，有時甚至是逐日向南京報送剿匪戰果，以及築路工程進展情況。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三月十八日，蔣鼎文電報蔣介石：「綏靖至二月底已擊斃馬立峰等人，俘獲朱祥儀等千餘人，收繳各式槍支彈藥」；「各區剿匪頗多斬獲，築路工程亦開展迅速」。²

馬立峰是中共閩東特委的重要領導人。馬係福建福安人，曾任福安縣委書記，閩東遊擊支隊政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五頁。

2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委，閩東特委委員、宣傳部長等職。在中共福州市委鄧子恢、陶鑄的領導下，展開武裝鬥爭，打擊國民黨武裝。紅軍長征後，葉飛、賴金彪所率獨立師撤出蘇區，而馬立峰率領部分武裝在蘇區牽制敵人，掩護撤退。其後所部化整為零，分散遊擊，轉戰在福安東區峻嶺群山之間。由於蔣部圍攻甚急，懸賞反正，致使紅三團代理團長游聚康經不住艱苦磨難和利益誘騙，叛變投敵。他於二月八日槍殺馬立峰，將人抬到國民黨綏靖處報功領賞。

由蔣鼎文收編成的地方保安團將瞿秋白抓捕，則是他攻佔瑞金以後為國民黨立下的又一大功。

瞿秋白是二月二十三日在長汀境內被捕的。瞿為江蘇常州人，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初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這期間，主持過中共中央工作。當時國民黨發出密令懸賞通緝瞿秋白、周恩來、陳紹禹（王明）、沈澤民、張聞天、羅登賢、秦邦憲（博古），擬定的賞銀：瞿、周各為兩萬元大洋，其他五人各為一萬元。其後，瞿秋白被米夫、王明排擠打擊，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十一月，出任中華蘇維埃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瞿有很高的文學素養，與魯迅關係密切，並用魯迅的筆名發表過多篇作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央通知瞿秋白到蘇區工作。

瞿秋白於次年一月初離開上海赴瑞金，經過輾轉，在二月五日到達瑞金。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後，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等十七人組成中央政府主席團，瞿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連任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

瞿到達瑞金之時，正是第五次圍剿緊鑼密鼓之際。他在瑞金僅僅八個多月，中央紅軍就迫不得已開始長征，然將體弱多病的瞿秋白留在江西，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兼中央政府辦事處教育人民委

員會委員。當時的瞿秋白身患肺病，三天兩頭發燒，身體極度虛弱。瞿曾請求隨軍遠行，知道像他這樣極易識別的人留下來凶多吉少，然又一次被中央最高決策機構所拒絕。

顧祝同、蔣鼎文率領的幾十萬大軍尚在贛、閩駐紮，再輔之以大量收編的地方保安團實施全面拉網式「清共剿匪」，在一片血雨腥風中，留守人員自是窘迫異常，危險異常。

極端的艱苦環境使瞿秋白的肺病日趨嚴重，為此中央分局決定送瞿轉道香港赴上海就醫。同行的還有何叔衡、鄧子恢及有孕在身的項英妻子張亮，以及稍後進入的蘇維埃司法人民委員會委員梁柏台之妻周月林。他們在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的安排下，化裝成香菇客商和眷屬，從瑞金啟程上路，於二月二十三日到達福建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逕村休息，因人多響動過大被當地的保安團發現。

水口鎮為福建省保安十四團的遊擊管轄區，長汀又是「清剿殘存共匪」的重點區域。該保安團為一支人數較多的「民軍」，團長叫鍾紹葵。鍾為福建武平岩人，是一個熟悉當地且有勢力的地頭蛇，曾殺害過不少蘇區幹部，擊殺過紅軍參謀處長許卓等人。手下嘍囉如狼似虎，兇殘無比。當時該團二營營長李玉得報發現有小股紅軍後，即率隊對小逕村實行包圍攻擊。瞿、何、鄧一行的武裝護送隊不力，很快被保安團擊散。經過激戰，瞿秋白和鄧子恢突出重圍，而何叔衡被圍，乃用手槍自殺致傷，滾落山崖。保安團在稻田裡發現重傷的何叔衡，並從他身上搜得五百元港幣和一些黃金。原來這筆款項是瞿一行從瑞金領到的交通費，每人一百元，由何集中保管。兩名保安隊員見財頓起殺人滅口之念，又舉槍補射，將奄奄一息的何叔衡殺害。

何叔衡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代表，曾任工農檢察長、最高法院主席、內務部代部長等職，時已

六十多歲，不意如此為奮鬥中的理想獻出了生命。

瞿秋白衝出重圍後，因病體支離，實在走不動了，乃靜息躲在灌木叢中，被保安隊搜山時發現，同時被俘的還有張亮、周月林。三個人被李玉嚴刑逼供，瞿堅不吐實，供稱叫林琪祥，為在上海經營舊書店及做些古董生意的商人。兩年前因病遊歷漳州，適逢紅軍打進漳州，被俘而送至瑞金，後攜款逃離，又為蘇區地方武裝發現，當夜由保衛局人員看押，準備明天再走，不意被發現又遭抓獲。張亮供名周連玉，說是香菇客商的老婆，被紅軍「綁票勒贖」；周月林供名陳（黃）秀英，說是紅軍的一位護士。

保安團團長鍾紹葵又親自提審，回答依然。但當得知瞿一行攜有黃金現鈔和武裝人員護送後，老奸巨猾的鍾紹葵判斷林琪祥有可能是共產黨的「要人」，便將他們關押於上杭監獄。一連幾天審訊，回答依然如故。此時的鍾紹葵已被蒙蔽，便讓他們寫信給上海朋友索取證明，並尋找鋪保，以證實與共產黨人確無關係，即可開釋。至四月十五日前，瞿秋白以林琪祥名義與上海的魯迅、周建人及其妻子楊之華取得聯繫，上海友人的營救在悄悄地進行中。

其時蔣鼎文報給蔣介石的清剿例行通報表中，還沒有關於瞿秋白的內容，說明蔣部還不知道已經抓獲共產黨重要人物，瞿的真實身分尚未暴露。而周月林、張亮則分別被保安團營長李玉與糖果店老闆納為「保姆」和「姨太太」，由此得以出獄。

但意外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四月十日，福建綏靖區陶峙岳的第八師在長汀、武平、會昌交界處的歸龍山下圍捕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萬等英勇犧牲，而萬的妻子被俘。在審訊中，萬妻供出瞿秋白、周月林、張亮等在長汀濯田地區被俘這一重要情況。

這一供情使事情陡然升級，陶峙岳立即電報蔣鼎文：「據萬匪永誠之妻供稱，予（瞿）秋白、何叔衡及項英之妻，均在灌（濯）田被我軍俘獲。」¹蔣鼎文得報後，高度重視這一未經證實的重要戰果，立即下令給福建第二綏靖區（駐龍岩）司令李默庵、長汀地區駐軍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要他們對扣押的所有人犯進行嚴密緊急排查，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之人。

湊巧的事接二連三發生，其時三十六師又俘獲長汀縣蘇維埃政府主席，據逼供，亦供認瞿秋白等一行已先期被抓。各方的情報彙集，使蔣鼎文既興奮又緊張，他再次下令所屬各部，務須澈底查獲。鍾紹葵的保安十四團接到電令後，趕緊變更原先計畫，將甚為可疑的林琪祥押送至長汀三十六師師部駐地，將張亮、周月林重新收監，押送至龍岩。鍾紹葵既感到責任重大，又覺得如能將瞿秋白清查出來，可以邀功邀賞，名利雙獲，所以十分賣力地再次排查。

而其時的張亮、周月林已被軟化，不一會張亮供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何叔衡在小逕村被打死，鄧子恢已突圍而出。周月林也附和了張的供詞。二人又公開發表「反共悔過書」。張、周二人被國民黨寬大處理，李默庵其後給蔣鼎文呈報對二人的處理意見，認為該二人「年幼識淺，被誘惑而入共黨。厥後既各與匪首締婚，則其行動，自不能不與之一致。究之彼輩婦女心理，其主旨之定見，信仰之堅決，當不能與匪首瞿秋白等相提並論」²。要求對該二人酌輕處分，蒙蔣獲准，李默庵的第二綏靖處判周、張各有期徒刑十年。兩年後，又以「在獄謹守規章，行狀善良，且體弱多病」為

1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福建民報》，轉引陳鐵健：《瞿秋白傳》，紅旗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三三五頁。

2 陳鐵健：《瞿秋白傳》，紅旗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三三六頁。

理由，將她們提前釋放。

不久，瞿秋白的身分得到他本人證實。對於瞿秋白的被捕和身分暴露情況，宋希濂有一個回憶：

依據當時情況推斷，紅軍大約主要是分成三部分分頭突圍。向東走的一部約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師一誘八旅所截擊，陷入包圍中，經過戰鬥，被解除了武裝。從俘虜的口供中，得知紅軍的主力部隊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餘人早先向上杭方面去了，在這三百多人中，有瞿秋白先生。鍾彬旅長立即將此情況電報長汀三十六師師部，師參謀長向賢矩根據這個情報急電報告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當時在上杭並無正規部隊，只駐有福建省政府所屬的保安第十四團，團長鍾紹葵，蔣鼎文立電該團嚴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在此之間向上杭方面走的紅軍三百多人，已被該保安團所截俘，內中有二十餘人，經該團查明的是紅軍幹部，寄押於上杭縣政府的監獄裡，瞿秋白先生當時化名林琪祥，說是在紅軍部隊中做文書工作的，即在其中。保安團接到蔣鼎文的電令後，一則感到他們的責任重大；一則覺得如能將瞿秋白清查出來，可以邀功邀賞，所以，十分賣力氣來進行這一工作。他們先將所俘紅軍士兵三百餘人再逐一查問，證實這些人中沒有疑問後，便肯定瞿秋白先生是在那二十多人中，於是進行個別審問，一次，兩次，……仍然沒有人供認，遂使用嚴刑拷打和「誰說出來就釋放誰」的雙管齊下的辦法，結果其中有一個人經不起革命的考驗而變節了，供出了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蔣鼎文接保安第十四團查出了瞿秋白的電報後，即命該團將瞿秋白解送到長汀三十六師師部。聽說該團派了一個連押送，

三十六師還派了隊伍到中途去接下來。¹

瞿秋白是五月九日被押到長汀的，拘押在長汀中學的三十六師師部之內。時師長宋希濂因傷未歸隊，第一次審訊是由師參謀長向賢矩、軍法處長吳淞濤、政訓處長蔣先啟主持的。剛開始瞿仍認定是林琪祥，直到向引進曾在蘇區教育人民委員會工作過並與瞿秋白相熟、已叛變的鄭大鵬指認，瞿秋白才坦陳自己的真實身分。

宋希濂傷癒返隊後也審訊過瞿秋白。

自五月十七日開始，瞿秋白知己凶多吉少，乃開始撰寫自傳體長文《多餘的話》，在文末，瞿還附寫了被俘的地點和時間：「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離開瑞金，二月二十三日抵福建長汀之水口時被鍾紹葵團俘，二月二十六日入上杭縣監，五月九日解到汀州三十六師師部。」

對於抓捕到瞿秋白這樣的要人，蔣鼎文高度重視，非常興奮，為此他急報蔣介石。蔣介石乃從南京派出原陝西省共青團書記、後叛變投降加入中統的陳建中專赴長汀勸降，其後又加派勸降專家「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特派福建黨務視察員」王傑夫趕赴長汀，目的是協助蔣鼎文力勸瞿秋白投靠國民黨。蔣鼎文與王傑夫、陳建中以及勸降小組成員錢永鍵、朱培璜等作了多次深入商談，商量使用如何手段能使瞿秋白歸順國民黨。「二蔣」深知，如能將瞿秋白成功勸降，則對低潮時的中共又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然所有軟硬兼施的手段都沒有達到目的。

¹ 宋希濂：《鷹犬將軍》，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一〇二——一〇三頁。

蔣介石於是給蔣鼎文下達了一道命令：「龍溪綏署蔣主任：寒（十四日）已法電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驗。中正。冬（二日）行息字印。」當收到蔣介石電令後，陳立夫又急電蔣鼎文請予稍緩。陳立夫還不死心，還要派人再對瞿秋白勸降，所以對瞿的行刑時間事實上推遲。然「二蔣」已無耐心，於是蔣鼎文暨李默庵於六月十五日、六月十六日、六月十七日連發三電，讓宋希濂迅速執行處決瞿秋白的命令。蔣鼎文同時讓宋在槍決瞿之後，將詳情密報於他，所有關於瞿秋白的材料都密寄他本人親收，不得有任何疏漏。

六月十八日上午，瞿秋白在長汀中山公園就義。執行命令的宋希濂回憶道：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我接到駐南京辦事處的電報，說本師有調動的消息。瞿秋白的問題如何處理是需要及早解決的。因此，我分別打了一個電報給蔣介石和蔣鼎文，請示處理辦法。我好像記得發給蔣鼎文的電報裡還談到如送去漳州，怎樣解決路上的安全問題。以後聽說蔣鼎文也有電報向蔣介石請示。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先後接到蔣介石和蔣鼎文均是「限即刻到」的電令：「著將瞿秋白就地處決具報。」當天晚上我和向賢矩及政訓處長蔣先啟、特務連長余冰研究了執行這個命令的具體措施。商定：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在中山公園槍決；在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園的路上及中山公園的周圍，均由警衛連嚴密警戒，禁止老百姓觀看；十八日晨早餐後，由向賢矩將蔣介石

的電令交瞿秋白看；由蔣先啟隨伴瞿秋白前往中山公園，並負責監督執行。

六月十八日早晨八點多鐘，在警戒方面部署妥當後，向賢矩進入秋白先生室內，將蔣介石的電報交秋白先生看……結束了秋白先生的生命，時間約在十時左右。

將秋白先生處決後，我叫人買了一口棺材裝殮，即埋葬在中山公園的旁側。在六月十八日下午，我將處決瞿秋白的情形，分電向蔣介石、蔣鼎文報告。¹

根據檔案資料記載，數日後宋希濂向他的頂頭上司蔣鼎文再作密電報告：

綏靖主任蔣：有未法電敬悉經。靖密。瞿匪秋白臨刑前槍決後之照片各兩張，並在杭之自供一份，呈報一份，在汀之口供一份，多餘的話一份，蘇維埃組織概要一份，及未成稿之目錄一份。已遵於感日密封郵呈，乞察核為禱。職宋希濂叩。感申印。²

電文中的「感日」為六月二十七日，說明為整理瞿秋白相關資料，宋希濂花費了一些時間。從宋希濂發給蔣鼎文的電文中不難看出，後來爭議不休的瞿秋白獄中所撰《多餘的話》文稿，宋也一併密送蔣鼎文寓目。四十多年後，宋希濂又向中央複查瞿秋白案組談及：「《多餘的話》我們向上級報了兩份，一份給東路軍司令蔣鼎文，一份給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向上級報的是手抄本，以示恭

1 宋希濂：《鷹犬將軍》，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一〇六一—一〇七頁。

2 中央檔案館藏影印件，轉引王鐵仙主編：《瞿秋白傳》，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四三一頁。

敬。」¹

在瞿秋白的身分被證實和槍殺以後，那位立「首功」的保安團長鍾紹葵，受到了「名利雙收」的獎勵。由於鍾紹葵是蔣鼎文親自收編的保安團頭目，蔣鼎文對他的提攜可謂不遺餘力，在他的推舉下，鍾紹葵從土包子變成正規軍，跨進了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將校班大門，並報蔣介石批准，特授少將軍銜。行政院長汪精衛電文嘉獎，發給鉅額賞銀；蔣介石也召見鍾紹葵，並授其中正劍。

五、上將煮酒排座次

一九三五年，對蔣鼎文個人來說，可謂達到他人生的一個高峰。

國民黨軍隊的軍銜制度在一九三五年之前比較紊亂，北洋時期的國民政府，以及孫中山時期的南方政府和武漢政府，「將軍」之銜授予不大嚴肅，有時甚至過於寬泛。北伐開始之時，國民政府的軍隊中已部分地實行了軍銜，像薛岳、熊斌、孫連仲、鹿鍾麟等已獲上將之銜，軍事參議院裡更是上將排排座，而戰場上稍有功績的師長、軍長一般都是中將。為改變這種軍階過濫的現象，軍政部長何應欽遵照蔣介石的旨意，於一九三五年初，以「陸軍官階過濫，殊非尊重名器之道」為由，呈請國民黨中央，提出減少上將員額，將一些名實不符的上將下調至中將，對中將、少將晉升進行嚴格控制，這一報告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表決獲得通過。稍前，國民政府又規定：「上將需經實職年資已滿並於國家建設有殊勳的中將晉任」，又加上二道門檻。

¹ 中央檔案館藏影印件，轉引王鐵仙主編：《瞿秋白傳》，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四三一頁。

一九三五年三月，《國民政府公報》公布《特級上將授任條例》、《上將任官施行條例》，明確規定「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為特級上將」，而符合晉升條件的「陸軍上將分一級、二級」。其時的中國，蔣介石認為中央紅軍已被他趕入絕境，澈底消滅只是時間遲早而已；地方實力派已無翻江倒海之力，再稍施收買，天下英雄就盡入其彀；日軍在窺測時機，中日難免一戰。故軍隊的整頓、將領們的論功行賞、名器之道需做法理程式上的調整，以便屆時集聚戰力，統一指揮。

於是，根據國民政府頒布的兩個條例，在四月一日，蔣介石被國民政府授任為「民國史上唯一的特級上將」。

四月二日，授任一級上將八人，為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陳濟棠。

四月三日，授任二級上將二十人，為陳調元、何成濬、朱紹良、韓復榘、宋哲元、劉湘、劉峙、萬福麟、何鍵、白崇禧、劉鎮華、顧祝同、商震、傅作義、徐永昌、于學忠、楊虎城、蔣鼎文、龍雲、徐源泉。

四月四日至十日，授任中將八十九人。

四月十三日至四月二十二日，授任少將二百三十多人。

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時候還沒有「上將」、「上將銜」一說，這兩個級別是後來因職多額少，矛盾突顯，作為一個過渡而追加的。還有一點也需要說明，這時公布的將領，除一級上將、二級上將之外，其他的中將、少將人數當不止這一些，尚有少數將領未經公報公布，但大體是如此了。故而一九三五年四月公布的首批上將、中將、少將，其「含金量」還是頗高的。

何應欽是一級上將中唯一的嫡系出身，占比八分之一。其他七人，除朱培德外，都是地方實力派第一號實權人物，他們與蔣介石明爭暗鬥，或殊死搏殺，至授任時亦未止息。

蔣鼎文與何應欽、朱培德的關係之深自不用多說；與李宗仁的關係也不淺，他們並肩作戰過，以至七年多以後，李還出面調停蔣鼎文與湯恩伯之間的矛盾。蔣鼎文與馮玉祥、閻錫山的單獨交往迄未見有更多的記載，只不過在戰場上時常兵戎相見，由此前推五年的中原大戰中，馮玉祥調集五個師，欲一舉將蔣鼎文的第九師聚殲，蔣險些被包了「餃子」；與閻錫山的直接交道，為閻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時，蔣鼎文、朱德等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與張學良的交往次數不多，然相識相談很深，兩人在交心的同時，還有一次意外的「流血交往」經歷，又平增友誼。西安事變前夕，蔣介石派蔣鼎文與張學良搭檔剿共，相知相交投緣也是一個因素。與陳濟棠，蔣鼎文不是一般的熟悉，而是私誼相厚。在首批一級上將中，陳的資歷或許最淺，起點也最低，但風雲際會，特別是福建事變的突發，使陳濟棠坐享漁翁之利，其軍事實力得到迅猛發展，乃有「南霸」一方、檄調全國地方武裝之勢。在「平閩」與「剿共」中，蔣、陳兩人頻頻相晤，共謀會商，合作不少。不過一年以後，陳濟棠欲在兩廣武力反蔣，蔣介石乃令蔣鼎文將部隊開駐粵邊。蔣鼎文在三天之內，便集結了五個師的兵力，向閩粵邊境挺進，同時致電陳濟棠：「你革命多年，屢立戰功，中央俾以東南重任，可謂厚矣！你妄圖變心，使人民遭受塗炭，於心何忍。且中央大軍已雲集邊境，如不亟早懸崖勒馬，李濟深前車之鑒當不遠矣。希兄痛改前非，弟當致電中央，確保你一切安全及出洋考察。」陳濟棠即覆電函：「吾兄金玉良言，深為感謝，方命尊辦，特覆。」¹如若不是「六一事變」和平解決，

1 何國亮：《我所知道的蔣鼎文》，《諸暨文史資料》一九八八年第三輯。

蔣鼎文的部隊即為入粵討陳的先鋒。

二級上將計二十位，這當中，真正屬於蔣介石嫡系的只有朱紹良、劉峙、顧祝同、蔣鼎文四人，占比五分之一。其他的二級上將大多來自各個地方實力派系，是較大派系中二號實權人物，在較小派系中為一號實權人物；還有個別將領原非嫡系，現為蔣介石所重用的軍事實掌者。

不難看出，對第一批的一、二級上將授任是在平衡各個派系，甚至有所「照顧」非嫡系。這種平衡術或者說凝聚技能確也反映出蔣介石作為政治家的非凡識見。軍銜的授予，是其時黨政軍一元化人物的畢生追求和人生成就體現，如若授受不公，立會引發尖銳的矛盾衝突，乃至意想不到的風雲變幻。

中央軍嫡系的一、二級上將共計五人，其中何應欽比其他四人資歷、官階均高一級。何應欽，字敬之，貴州興義縣人，一八九〇年四月出生，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入黃埔軍校前任過團長、旅長、雲南講武堂教務長、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等職。進入黃埔後，任軍校戰術少將總教官，建立黃埔軍校教導團時為教導團第一團團長、第一師師長。蔣介石辭去第一軍軍長後，由何應欽接任，其後何又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軍政部長兼武漢行營主任、鄭州行營主任等職。這次國民政府統



二級上將蔣鼎文

一授銜，具體由他經辦。何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軍政部長。何應欽是除蔣介石以外的國民黨軍界的第二號實權人物，他出任一級上將名至實歸。

再來說說四位嫡系二級上將。

朱紹良是四位二級上將中唯一不是黃埔出身的嫡系將領，但他卻是蔣介石的老同事、老戰友。朱紹良，字一民，原籍江蘇武進，出生於福州。一八九一年生，早年入日本振武學校，並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任黔軍司令部參謀長、代理總司令，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任大本營高級參謀。北伐後，歷任師參謀長、總司令部武昌行營參謀長、第九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等職。蔣介石下野後，朱亦去職。蔣復職後，朱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政廳長。當軍隊編遣時，出任第八師師長。至一九二九年三月，朱紹良任重新編配的第二軍首任軍長，其時蔣鼎文師即歸該軍所屬。朱又任中原大戰時右翼軍總指揮，參與指揮對中央紅軍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紅軍時，朱紹良為甘肅省政府主席。這次授予二級上將時，朱紹良任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正在追堵长征中的紅軍和圍攻西北方面的紅軍。所以朱紹良雖非黃埔出身，卻是深得蔣介石信任的嫡系將領，直至以終。

劉峙是「福將」之說可謂流傳甚廣，即或連劉峙本人也知道，他曾自我解嘲地說：「有人恭維我是福將，因之所向無敵。假如世界上確有所謂福氣可以擊敗敵人的話，那麼這個福氣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與膽識，再加上百分之一的機遇和其他的因素。」¹

1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書館一九六六年版，第一〇五—一〇六頁。

確實，劉峙的二級上將是他在烽火硝煙中實打出來的，而不是「福氣」所致。劉峙，字經扶，號天廬，江西廬陵（今屬吉安）人，一八九二年出生於一個農村家庭。留學日本不成被遣返回國，後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步科。畢業後先後在粵、川、滇軍中服役，歷任營長、團長等職，任過孫中山北伐大本營第一遊擊大隊長，建國粵軍上校軍事參議等職。黃埔軍校創建，被蔣介石聘為少校戰術教官。黃埔軍校教導團東征時，任第一團第二營營長；第一次東征後，升任團長；第二次東征後任副師長兼參謀長；至北伐開始，為第一軍第二師師長。蔣鼎文即為該師所屬的第五團團長。當劉峙升為第一軍軍長後，蔣鼎文則為該軍的第一師師長；當劉峙升為軍團總指揮時，蔣鼎文遞任為第一軍軍長。

劉峙在討伐唐生智和中原大戰中均任一方面總指揮，尤在中原大戰中戰功卓著，獲勝之後，蔣介石任命劉峙為河南省政府主席，稍後改任駐豫綏靖公署主任。劉又任過圍剿鄂豫皖蘇區的中路軍副司令官（總司令蔣介石兼），因同紅軍作戰有功，蔣介石在河南新建一縣，命名為「經扶縣」（另一為安徽以衛立煌命名的「立煌」縣）。以生人冠名，世所罕見，亦可見蔣對劉的器重和籠絡。劉峙出任二級上將時，擔任駐豫綏靖主任一職。

與朱紹良、劉峙的資歷相比，顧祝同稍淺。但黃埔起步時，顧比劉略高。顧祝同，字墨三，江蘇安東（今屬漣水）人，一八九三年出生，家境貧寒。在當地縣城高等小學畢業後，投考南京陸軍小學第五期，讀書從軍反覆幾次，後保送至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次年畢業。歷任連長、營附等職。與蔣介石相識後，先後在粵軍任中校副官、上校參議。黃埔軍校成立時，被蔣介石聘為中校戰術教官，又兼代軍校管理部主任。黃埔軍校教導二團成立時為第一營營長。第一次東征結束

後，調升為第二團參謀長；第二次東征結束後，任第三師上校參謀長，旋升為第三師少將副師長；北伐開始不到半年升為第三師師長。一九二七年九月顧以第九軍軍長兼第三師師長。其時蔣鼎文還在寧波浙東警備司令任上，直到同年十月，蔣介石策動何應欽任命蔣鼎文為第一師師長。

蔣桂戰爭之時，顧祝同任第一軍軍長兼第二師師長，中原大戰中任隴海路前敵總指揮。戰後顧任陸海空總司令洛陽行營主任，後又改稱潼關行營主任。旋調任江蘇省政府主席，任職不到兩年，調任「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北路軍總司令，與蔣鼎文搭檔，蔣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自此後，顧、蔣在同一職位上有過多次交集機會，但只有一次成功交接，對此下文還將提及。

不過，在此前顧祝同與蔣鼎文有兩次「生死交往」，雖不是發生在戰場上，然聽來還是驚心動魄。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初春，顧祝同在潼關任行營主任，蔣鼎文在洛陽兼任警備司令。未幾，顧到洛陽與蔣商量軍事部署，兩人談得十分投入。事畢，由鐵甲車司令蔣鋤歐安排顧乘鐵甲車返回潼關。顧因此行僅警衛、隨員十數人，故鐵甲車只掛了一節車廂。車行至隴海線最高點觀音堂車站時本需減速，因為自觀音堂向西全是下坡，且下坡線路有幾十里之途，然司機不熟悉隴海線這一段的地理狀況，依然以爬坡的動力前行，於是鐵甲車越行越快，司機頓時緊張，但又不敢煞車，恐導致傾覆。顧等一行驚惶失色，只有雙手抓緊柵欄，任憑鐵甲車快速下行，如此直洩幾十多里到達峽州站。車站值班之人見車速如此快捷，趕忙扳開車閘放行，鐵甲車又向西衝了十多華里，直至平坦地段才慢慢停車，然後再緩速開至潼關。顧等躲過這場無妄之險。蔣鼎文事後聞悉，忙電話壓驚，兩人額手稱慶。

還有一次則是飛機遇險，時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當時蔣鼎文的東路軍未能按照蔣介石的時

限攻取長汀，引起蔣介石不悅，即令顧祝同率韓德勤、郭懺二位參謀長由南昌起飛至龍岩，實地察看，並分析是何原因遲至。顧、韓、郭分乘三架小飛機前往，顧先行，韓、郭後隨，然韓、郭已抵達，顧的飛機卻始終不見來，蔣等焦急萬分，四處電訊也未有消息。顧的飛機由資深飛行員、航空第三隊隊長張由谷駕駛，他們在南城停搭加油後繼續飛行，不意機件發生故障，乃採取緊急迫降措施，然機下並無平坦之地，只有迫降於山間梯田，為田埂所阻，飛機翻滾幾圈後才停住。顧、張兩人只是輕微受傷，身體並無大礙，只不過所處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不知身在何方。正當他們一籌莫展時，宋希濂部的哨兵在巡邏時發現了他們，稍加詢問後，即把顧、張帶到營部，迅即電話告知龍岩，第二天顧乘汽車抵達目的地。蔣鼎文告訴顧祝同，所迫降地點恰是紅軍控制區域的邊緣，如果飛機稍微偏離，則成紅軍的戰俘無疑。

如此化險為夷的經歷，也增添了兩人之間的話題和別樣的友誼。

顧這次授二級上將時的職務為駐贛綏靖區主任。

可見，與朱紹良、劉峙、顧祝同相比，蔣鼎文的資歷還是要淺一些。蔣鼎文之所以能取得二級上將席位，還是他的戰功在發揮重要作用，按照當時國民政府的官方語言是：他當屬「於國家建設有殊勳的中將」。

其實，蔣鼎文入黃埔軍校之前的經歷並不算低。浙江講武學堂畢業後，憑藉他血氣方剛的膽魄，以小小排長策動浙江獨立。其後與蔣尊簋、王文慶等長一輩軍人在廣東、福建奔走，策動赴閩浙軍起義，投奔孫中山陣營，歷任西南軍政府和護法軍政府中校、上校參謀等職。

蔣鼎文與蔣介石於一九一八年八月相識於福建長泰，蔣介石時任粵軍第二支隊長。當時蔣鼎文

的頂頭上司王文慶不大認同蔣介石，認為蔣介石這個人「難纏」，不值得深交，多次叮囑蔣鼎文注意。或因此之故，「二蔣」在黃埔軍校之前交情泛泛，並不深厚。

而蔣鼎文認準了人生方向，以上校降級報考黃埔軍校學生區隊長職位，此職初只有中尉銜，稍後才為上尉。由此，他在人生路上重新起步，誠不愧為順潮流、識時務的俊傑。

軍校教導團成立之初，蔣鼎文任教導第一團第一營副營長（營長沈應時）兼第二連連長。第一次東征時適逢沈應時受傷，蔣代理營長指揮淡水之戰，顯露出色的作戰指揮能力，繼在棉湖之役，蔣所率第一營幾乎以一當十，擊退陳炯明勁旅，而蔣身負重傷，依然衝鋒不退，使蔣介石認識到其英勇。未幾，任二師五團團長。又在中山艦事件中充分領會蔣介石的意圖，起到了一石三鳥的震懾作用。當北伐進入中期，傷兵鬧事層出不窮，蔣介石感到頗為棘手，又是蔣鼎文恩威並施，把一批恃功倨傲的各路傷病官兵訓練成出色的國民政府警衛團，讓蔣介石感到其獨立的組織統兵才能。

蔣介石第一次下野之時，把蔣鼎文安排到其家鄉寧波，出任浙東警備司令，蔣鼎文奉其意圖又與時任浙江軍政界的首腦人物周鳳岐鬥法。當蔣介石赴日本前夕，與何應欽商定，任蔣鼎文為第一師師長。由此蔣鼎文在軍事舞臺上顯示出全面的軍事才能，蔣馮、蔣桂、蔣唐戰爭以及稍後的中原大戰，他「飛將軍」稱號得以一步一步成名。

蔣鼎文僅以中尉起步於黃埔軍校，所以他在其後的軍人生涯上是「奮力追趕」，至一九二八年整編時，他出任整編後的第九師師長，與朱、劉、顧職銜齊平；至中原大戰結束，由於戰功卓著，且是主力第一師的「中興」師長、第九師的創立師長，資歷、戰功漸趨完備，已基本可與朱、劉、顧平起平坐；第三次圍剿後期，蔣鼎文由於對方志敏紅十軍清剿得手，又向蔣介石進獻進剿方略，

故而蔣介石讓蔣鼎文出任第五次圍剿時的主力部隊北路軍前敵總指揮，讓其帶領人數最多的主力部隊衝鋒陷陣。

適逢福建事變發生，蔣鼎文所指揮的十五個師在短短的二個多月時間內，就平定閩變，從而使蔣介石在圍剿紅軍部署中取得戰略上的主動。蔣介石決然從北路軍分出東路軍，並讓蔣鼎文出任總司令。蔣鼎文率部從福建向西進攻中央蘇區紅軍，下長汀，占會昌，並首先攻克瑞金，終於使蔣介石達到了預期的軍事政治目的。

到一九三五年四月，蔣鼎文被授予二級上將時，他的職位為駐閩綏靖區主任，已完全可與朱、劉、顧並駕齊驅。蔣鼎文的戰功，在國民黨軍史中評價甚高。臺灣史書吳相湘《民國百人傳·蔣鼎文》開頭即謂：「蔣鼎文在國民革命軍戰史中保有勇敢善戰的紀錄。」十年，無疑是人生的一個週期。如果以黃埔師生為例，那麼一九三五年就是這批風雲人物的重要節點。回頭盤點一下十年以前的黃埔軍校教職員名錄，在教官中，何應欽、劉峙、顧祝同脫穎而出，錢大鈞、陳繼承、陳誠、張治中緊隨其後，而蔣鼎文，則是上升速度最快、風頭強勁的二級上將。

當然，在這眾多教職員中，也有因政治信仰、作戰犧牲，或其他原因中途分道揚鑣，致使無從比較的，但細數起來，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不帶普遍性。

由此可見，一將的功成不僅僅是「無定河邊骨」的堆砌。

四個二級上將中，顧祝同赴臺灣後依然在軍中任職，一九五四年七月晉升為一級上將；朱紹良到臺灣次年退出軍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病逝，追晉為一級上將；蔣鼎文抗戰勝利後不再在戰事第一線衝鋒陷陣，至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退出軍界，一九七四年一月逝世後被追晉為一級上將；劉峙

於淮海戰役後，瞬間淡出，至一九七一年一月病故，但這位老資格的嫡系將領卻止步於二級上將，在他死後蔣介石沒有給予追晉。

按照傳統的主流說法，蔣介石手下有「八大金剛」和「五虎上將」及「三鼎甲」。「八大金剛」除上述何應欽、劉峙、顧祝同、蔣鼎文外，乃將朱紹良換成資歷相當的錢大鈞，另加了陳誠、陳繼承、張治中，顯係全為黃埔出身。而國民黨軍方還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抗戰以前，軍中的「三鼎甲」為劉峙、顧祝同、蔣鼎文，尤蔣因作戰勇猛善戰，又叫他小趙雲、拼命三郎。

如果將黃埔軍校做為「八大金剛」的軍人起點，那麼蔣鼎文起步還是最低。何、劉、顧前已略述，而錢大鈞、陳繼承是中校級的軍事教官，陳誠是校長室的上尉官佐，張治中雖晚來半年，然其開步即是黃埔軍校的上校副代理總隊長。到了正式授受將軍職銜時，這四個人的官職，錢大鈞為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參謀長，軍委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張治中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陳誠為駐贛綏靖軍預備軍總指揮，軍委會宜昌行轅副主任；陳繼承為駐贛第四綏靖區司令官。特別是錢大鈞、張治中的資歷，錢是一九二六年的師長，次年的軍長，乃至整編後的第三師師長；張是一九二八年的軍政廳長，次年的軍長。但部隊整編時陳誠、陳繼承與蔣鼎文等拉開了差距，陳誠一九二七年當上師長，在整編時為第十一師副師長。一九二八年七月的軍隊大整編，這是國民黨老資格軍人非常看重的門檻，他們的戰功、資歷都在其時的任職中得到集中體現；其後陳誠又在蔣鼎文所屬的第二軍任師長；至中原大戰後，陳誠方才出任第十八軍軍長，從此有了他以後賴以起家的基本部隊。第四次圍剿時，陳誠出任中路軍司令，雖被打得灰頭土臉，但依然為蔣介石所信任；到第五次圍剿時，陳誠繼蔣鼎文出任北路軍前敵總指揮，與紅軍打得風生水起，為蔣介石圍剿紅軍立下戰功。陳繼承

亦然，早在一九二七年當上了師長，但次年整編時變成了副師長，兩年後再出任軍長，然後出任綏靖區司令官。

竊以為，如果要將「八大金剛」排個座次，那麼時間節點要相同，如果起點不同，就是時空不同、環境不同、對象不同，會造成名與實的疏離，所謂比較，無疑要從戰功、資歷、軍職、服役年限等方面綜合考慮。在國民政府第一次統一授予軍銜時，錢大鈞、陳誠、張治中、陳繼承都還是中將；前三位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實職中將領上將之銜，其中陳誠於四年以後提為二級上將，張治中於十年後提為二級上將，而錢大鈞未再提銜；陳繼承則止步於中將。「八大金剛」或可依次排成何應欽、劉峙、顧祝同、蔣鼎文、陳誠、錢大鈞、張治中、陳繼承。

這種「座次」排列，不意在國民黨軍的原始資料中也得到印證。一九四〇年二月，何應欽五十壽辰，中央軍黃埔系最高軍階眾將領為其祝壽，並由「黨國文膽」為何應欽撰寫了《何公五十壽敘》，壽文由名家沈尹默書就。由於書法精妙絕倫，至今公開傳世甚廣。上署祝壽者九人，依次為顧祝同、劉峙、蔣鼎文、陳誠、錢大鈞、張治中、陳繼承、王懋功、俞飛鵬。所謂的「八大金剛」，包括何

參、公、然、以、兼、早、政、部、長、敬、之、何、公、五、十、壽、敘
言者非有所阿私也
顧祝同 劉峙 蔣鼎文 陳誠 錢大鈞 張治中 陳繼承 王懋功 俞飛鵬 同拜祝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穀旦吳興沈尹默敬書

《何公五十壽敘》影印件局部

應欽全在上面，論王、俞的資歷幾可與何應欽齊驅，但在風頭正勁的眾「金剛」面前也只得忝陪末座。

在「八大金剛」中，蔣鼎文與何應欽、劉峙、顧祝同、錢大鈞談得來，相交合拍。與何應欽之間，不僅在公幹層面，私下亦相和睦。然西安事變期間，兩人一度產生誤會，以致互不交心，直至抗戰勝利後，才冰釋前嫌，重歸於好。與劉峙、顧祝同、錢大鈞更貼近一些。劉峙輾轉到臺灣後頗顯落魄，而蔣鼎文處境較好，積極為劉峙奔走，在醫療診治待遇和經濟上有所照拂；與顧祝同則兩心相印，按照顧的原話，他與蔣銘三「在公是義同一體，在私則情若昆弟」；與錢大鈞的關係，錢是這樣說的：「我與銘三兄訂交五十年，患難與共，甘苦共嘗」，越到後來「情益篤而誼益深，至死不渝」。蔣鼎文曾詩贈錢大鈞：「東征北伐告成功，五十年來休戚同；各負創傷都不死，並經幽繫脫樊籠。」

與陳誠之間，前已述，陳原為蔣鼎文的下級，然兩人性格不大相合，且時不時有爭吵。陳誠手腕高明，人又精明勤奮，舉止行為乃至生活方式都迎合蔣介石的心理，常常越級報告，在政治舞臺上可謂長袖善舞，於是陳誠的地位不知不覺間就超過了蔣鼎文；而高傲的蔣鼎文則逆勢而行，你權越大，我則越疏離。

對於張治中，蔣鼎文認為他是個軍事理論人才，而不是第一線的統兵戰將，在平閩時，張屬蔣鼎文指揮，兩人關係不深不淺。張治中後來走向光明之道，則是「八大金剛」中真正識時務者也。

而陳繼承，與蔣鼎文並肩作戰不少，北伐時，兩人同為劉峙師所屬團長；打張宗昌時，兩人又同為何應欽第一路軍的師長。至於在私誼方面未見記述，因而不妄加議論了。

「八大金剛」中，何應欽、張治中年齡相同，顧祝同、錢大鈞、陳繼承都生於一八九三年，而

劉峙則比他們大一歲，蔣鼎文與陳誠年紀最輕。宿命的安排是最年輕的陳誠離世最早，最年長的何應欽去世最遲。

至於蔣介石的「五虎上將」，通常的說法是指劉峙、顧祝同、蔣鼎文、陳誠、衛立煌。如果以一九三五年四月授銜時為起點，其時的陳、衛還只是中將，尚不能歸屬「五虎上將」之列，陳、衛是四年以後的一九三九年五月才同時由中將提升為二級上將的，在這之前，陳、衛不可與劉、顧、蔣相提並論。至於軍事生涯的縱向比較，就不知依哪種方式來界定時間節點了。劉峙一度是顧、蔣、陳的上級，而陳、衛曾是蔣鼎文的直接屬下，尤其是陳誠，歸蔣鼎文指揮的時間還不短。五人之中，劉、顧、蔣、衛是比較典型的軍人，而陳誠則抱遠圖宏志，跨越軍界，俯仰不移，凡事立言，注重歷史感，期在汗青上占席謀地，客觀上也成為有一定影響的政治家。當然，所謂國民黨「五虎上將」指向上述五人，還是一種主流的提法。

「三鼎甲」則很清楚，謂劉峙、顧祝同、蔣鼎文。

還有一個歷史事實值得注意，在國民政府首次統一授銜時的八十九名中將中，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只有三人（沒有第二期及其以後屆次的），即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其他大多是國內外軍校畢業生或各個實力派系中的資深軍人，包括張發奎、余漢謀、孫連仲、蔣伯誠、陳儀、黃紹竑等資格非常老的軍人。¹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的大多高級別軍官，在當時被授予少將或以後才被授予的。顯然，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比同輩學生高出一截。然這三人中，胡宗南、李延年均是

1 參見劉國銘主編：《民國軍政職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七一四—七一五頁。

蔣鼎文在第一師和第九師師長任上舉薦才得以提升。胡、李被授中將銜時，分任第一師、第九師師長，可見這兩個師在國民政府軍隊中位置之重要。還有一個被譽為「又文又武李默庵」，其時是蔣鼎文屬下的師長，龍岩綏靖區司令。「二李」被授中將銜時均在蔣鼎文執掌的福建綏靖區任職。

歷史當然不能假設，如果樓景樾不在一九三三年病逝，那麼其豐富的經歷、不凡的戰功，蔣介石的器重，又是顧祝同、蔣鼎文舉薦的軍事幹才，如日中天的主力師資深師長，當是黃埔第一期學生中又一位首授中將。

在這次全國統一的將領授銜過程中，我們可充分領略到蔣介石的政治平衡術和領軍統帥的藝術。客觀地說，蔣介石對嫡系軍人以忠誠能幹為度量，對地方派系則以軟化感召為吸納，他還是在搞「五湖四海」，而不僅是蔣記一家。至少其時的蔣介石還不像李宗仁所說——蔣介石先生的「夾袋中人物」只有「陳誠、顧祝同、蔣鼎文、劉峙、張治中、張群等人」¹。

同年七月十四日，蔣鼎文當選為全國國防會議委員。

同年十一月，在國民黨第五屆大會上，蔣鼎文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其後連任三屆中執委，直至國民黨退出大陸舞臺。

從這年開始，蔣鼎文已集中央大員、封疆大吏於一身。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六三六頁。